

隔靴搔癢

曾熾豪著

新社文藝叢書

第二輯 第一集

內容提要

散文集「隔靴的搔痒」為曾熾豪之第一本單行本，所收集者，皆為作者多年來呕心瀝血之作。作者之藝術修養深湛，故對於此方面之理論，每具獨特之見解；加以文筆凝鍊，字字珠璣，筆鋒尖刻處，復帶濃厚之感情。梁實秋「雅舍小品」，余光中論詩文諸作之後，一冊而已。





隔靴的搔痒

曾熾豪著

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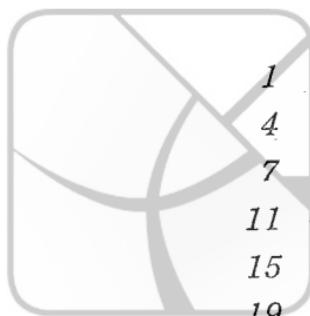
新社文艺叢書第二辑第一集

新社文艺編委会主編

一九七一年七月

新加坡

目 次



- 一
- 1 談友誼
 - 4 闲話聊天
 - 7 漫談散步
 - 11 忙里偷閒
 - 15 藝術家與窮
 - 19 書·讀書

二

- 29 論藝術的風格
- 35 風格的自覺
- 41 藝術的散文
- 45 期待新散文的出現
- 54 隔靴的搔癮
- 59 梦囈與胡說之間
- 64 藝術的簡與繁
- 70 美術的節奏
- 78 詩品的文學觀

談 友 誼

據說神仙是孤独的，我才不妄做神仙，蓬萊不是我的份。流落在荒島中的魯賓遜，尙且有一隻狗和一个土人「星期五」作伴；一個人要是沒有朋友，那么他的情形比起魯賓遜就好不了多少了。

我是个对艺术深感兴趣的人，交友一事，自不免委从美的观点去看它。然则从美的观点，会有些什么看法呢？当然，如果我声称，不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人，我不跟他交往，就凭这怪脾气，自不难名見經传；但我倒不準備以此出名，我只希望我的朋友具有內在美罢了。不过，如果他兼备外在美，我也不以为不妙。

我衷心的感到，性格不同不一定是友誼的障碍，問題只在我们是否够通达、去欣賞不同的性格美罢了。有些人活潑得像条小龙，固然可爱；有些人稳重得像一座山，又何尝不可爱？有些人說做就做，好像一具火车头，充满着活力，固然可爱；有些人深謀远慮而不愿轻举妄动，每一着都非常慎重，又何尝不可爱？有些人有大刀 間斧的魄力，固然可爱；有些人有最細密的綉花針工夫，亦何尝不可爱？只要对不同的性格有相当的認訝，去發現其中的美，便不是一件难事。

其实性格不同可以做朋友，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論根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一個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或多或少与众不同；虽有「大同」，毕竟还有「小异」。絕對的「情投意合」恐怕不仅不可能而且不理想。由於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差异，每个人的价值觀和人生觀就不必雷同。我的作风对我是好的，对你就不一定好，正如我的衣服我自己穿上固然十分美观，但給你穿上就未必好看。同样地，別人之爱吃肉何碍於我之爱吃魚呢？我们沒有理由强人所好。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不难免除許多誤会，这等於開闢了一条与人交往的坦途。所以我說，必先能欣賞种种不同的性格的美，否則我们不会有一个够大的胸襟，去容納这个多彩的世界。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友朋之间，吹求必不可有，了解必不可少。

可矣；全不了解而能結為莫逆，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但了解一个人決非易事，这是我近來的體驗。有多年的朋友或多年的同事而不能互相了解的。其实了解一个人、賞識一个人，自己也多少要有点才性；所謂「慧眼認英雄」，因此在一个蠢材的眼里，天才往往不是天才，因为蠢材到底是蠢材。如果是这样的不了解，那是可以原諒的。不过通常的誤解多半是因为粗心，「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有些聪明人有一套十拿九稳的心理学（可惜不是十拿十稳），处处以自己的心肝量別人的肚皮；做出强奸民意的尷尬的局面來，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令人啼笑皆非。碰到这种人，除了「一笑置之」之外，我希望你能替他惋惜。我们既然不希望为人所誤解，就应当从自己做起，設法了解人家，最低限度不把人誤解才行。

不过友誼的基礎，却必須建立在好感上。有些人一旦相見，便有恨晚之叹，这便是因为彼此间均有好感。好感是綜合的、直覺的，有时不能拿理性來分析。「这傢伙我看着就討厭」，這話虽不免有点任性，却是偏激中寓有至理，有时也无可奈何。討厭就是討厭。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机半句多」。試想，硬要我們和一些言語空泛、面目可憎的傢伙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件苦事嗎？不过千万不可以空緣空故的討厭，否則那就会給人說你有点古怪了。

我覺得有一件事是最現實不過的，那便是：想交什么質素的朋友，你自己應該是什么質素的人。因此，想交言語有味、面目可愛的朋友，你自己就得設法使言語从空泛变为有味、使面目从可憎变为可爱了，这恐怕不是花言巧語或胭脂鉛粉所能补救的。西諺有云：「你把你朋友告訴我，我就能把你的为人告訴你。」我起初总是大惑不解，覺得这种「相术」，简直妙不可言，高深莫測；后來才了悟這話原末充滿着智慧，寓意頗深，值得細心玩味。

如果說友誼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那么这种禮物，倒有点像鑽藏，並不是摆在我们的跟前，並非俯拾即是，而是須要費些工夫去探測、去發掘才能得到的。因此，我以为友朋間彼此必須有好感，但仅仅靠好感毕竟是不够的。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句話一方面固然說明了朋友的

重妥，另一方面却流露出一种不足为訓的心理作用——依賴性，其出发点是利己的，恕我不能給予很高的評價。我以为最崇高的友誼是施予的、利他的、自我牺牲的、乐人之所乐的。如果把友誼当作一樁情感的交易，处处銖錙必較，試想这种友誼，格調怎么会高？設若等而下之，比情感的交易还低一級，这种交往，不能名之为友誼，因为它不配。

我以为友朋间偶然有些爭吵，發發脾气，均不足为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說是好的。正如一对情人，若早就有了裂痕，表面上虽然敷衍，实則兒合神离，那就不值得羨慕。假如另有一对情人，时常吵吵闹闹，却又亲热得什么似的，正是「打是疼你罵是愛」，也並非不值得讚美。不妥以为这是幽默，不！这里面有严肃的道理在。你有沒有注意到，对一个不甚相熟的人，人们总是客客气气、必恭必敬嗎？这表明彼此间尚有一段頗大的距离，他们都不好不以喬裝的自我出現；反之，如果竟不惜吵吵闹闹，而以赤裸裸的自我出現，这表明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小多了。个性和見解是千差万殊的，好在道並行而不悖，並不是大忌，当然也妥有个限度；其实，哪件事不須妥有个限度呢？最妥紧的毕竟是你的心，如果你是出於一片赤誠，那么一切都可加以原諒；如果你居心不良，那么一切都不可原宥。

怎么样的朋友才称是最理想的朋友呢？这个问题我想还不太难解答。我以为最理想的朋友必須具备三个条件，那便是：可佩、可爱、可敬。一个人若有过人的才华，或湛深的学养，他自然能令人佩服；但才华多少是天賦的，学养亦非一朝一夕所可一蹴而成？不过他总可以做到可爱这点。至於怎样使自己变得可爱，恕我不能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不过我可以劝你在消极方面，努力把不可爱的地方減少到最低限度。这虽然也不太容易，可是玄論如何，你总妥做到可敬这一点，因为一副善良、純潔、完美的心灵，只要你肯立意，是絕對可以修养得到的。然則，在才学上令人佩服、在情感上引人共鳴、在德性上堪为风範，这样的朋友，普天之下，妥到哪兒去尋找呢？难怪有人說：「相認滿天下，知己能几人？」「得一知己，終身玄憾」；可見得到两个知己，應該是三生有幸了；若得到两个以上的知己，那是前世修来的福份，非人力所能为。

閒話聊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尽有不少事，乍看似乎玄闕宏旨，实則是不可或缺的。聊天便是其中之一。很少人会把聊天看得像閑门七事一样重姦，更少人費心研求聊天的艺术。「羣居終日，言不及义，难矣哉！」巧言令色，古之所戒；據說木訥所以近於仁。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真理，那就太难說了。如果不說話就是一种美德，那么最具有这种美德的，就莫过於啞吧；如果不苟言笑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那么最精於生活艺术的，就莫过於那些臉黑黑、遇之令人恨不得落荒而逃的老夫子了。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有許多謬論，並不足怪，因为衣冠的禽兽固多，素餐的屍位亦復不少。要在芸芸众生中寻找一种完全自觉的生活的典型，談何容易？

禽兽也未必甘於寂寞，两条狗在一块兒的时候很少不此呼彼应的；两个人在一块兒而一言不發，其难堪处，殆只有坐於針氈可比了。据說默然相对，亦別是一番妙境，頗為詩人文士所低徊。「此时玄声胜有声」，有时語言反嫌多餘累贅。但这种妙境，也只有在两个人心心相印时偶可得之。若逢人便鑿以「玄言」，我不敢担保你不被人目为怪物。

閒談的价值，就在於它有一种鬆弛作用。我们走了段远路就想喝杯水；伏案久了就想伸个懶腰；同样的，經过了持久的工作，我们便很自然的想鬆弛鬆弛过度緊張的身心，以期从另一种情境中，驅除身心的疲憊，恢復神志的清明，俾能養精蓄銳，再接再厉。聊天便有这种妙用。

有些人談鋒很健，可謂口若懸河、舌灿莲花，能够滔滔不絕地談上三万八千个回合而了无倦容，甚至能控制各人的感情。他使你歌哭啼笑、不能自己。他要你高兴，你就沒法不高兴；他要你悲伤，你就无法不悲伤；他能令举座騰欢。談笑风生者，此之謂也。这种异人自然是聊天的高手。不过凡事总是过犹不及。有些人不知是否發音机能

有异状，不說話就难得舒服。說起話來，如蛙鳴、如蟬噪、如黃鐘、如大呂、如瓦瓶之乍破、如鐵騎之突出，嘎嘎然，喳喳然，一瀉千里，夾沙泥以俱下，当之者玄不披靡，恨不得掩耳却走，旁人除了只能挤进几个标点之外，是没有招架的餘地的。这种談話可謂不折不扣的「一面倒的談話」。这种霸道的「長舌男」我很怀疑他会受人欢迎。不过对付这种人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委时时給他补充一句，讓他覺得他的話沒有自說。所謂「牡丹虽好，还須綠叶扶持」，便是这个道理。这样一来，他就一定会因为充份表現自己卓絕的口才而欣然，而我们也就因为他的欣然而欣然了。

有些人像緘口的金人，任凭你怎样激發他，也难得使他說上几句，真是孺子不可教。这种人不但自己沒趣，还足以扫兴而有餘。据说有过这么一件事：甲乙两人同处一隅。一日，某丙过訪，寒暄過後，話盒子便應該打開。毋乃某丙硬是枯坐不語，比木偶只多两口气，比木乃伊只多两眨眼。这如何是好呢？为了委打破这可咀咒的僵局，某甲和某乙便只好竭力輪流挑逗他，企图引起他的話兴。豈料这块不可雕的朽木却半点反应也沒有。在不知不覺之间，某甲跟某乙竟忘記了他们神圣的任务，而对談起来，而且談得津津有味，已不知有某丙之存在，良久始發現某丙正枯坐一角，目瞪口呆，有如木雞。放心，他死不了。

談鋒健，口才好，这种人自然是理想的談天对象，但最重委的还不是口才。巧妇豈能为玄米之炊？花言巧語，絕對是空洞的，不会有什麼內容。最委紧的，毕竟还是丰富的內容。一个人若有不尋常的经历、渊博的知識、超卓的智慧、丰富的生活体验、或优美的心灵，就不愁沒有可資言談的材料。若兼之以嫋練的口才，固如錦上綻花；若付闕如，亦玄伤大雅。「言必雅馴」，何必在玄拘玄束的閒談中寻求呢？

所謂有內容，不必含有什麼微言大义，事实上，酸秀才的方巾之气倒真是聊天之忌，沒有比板起面孔，滿咀仁义道德的道学夫子更煞风景的了。只委不是誨淫誨盜，虽未必均有「与君一夕話，胜讀十年書」的收效，却也总是「開口有益」，很「衛生」的。

有些人不但言語玄味，甚至面目可憎。这种人大概生活過於平

凡，一件毫不足道的事也不惜几次三番不厌其詳地說了又說道了又道。除了囉嗦之外，还是貧乏。我們應該原諒他，因为他的一生，除了所講的一丁点光荣史之外，简直是一片空白。这种人我們希望他少開尊口惟恐不及，那里还敢奢望他給我們作有趣的清談呢？不过一个人的言語是否有味，与其生活的丰富，与夫所談的書，所走的路之多寡，也並非必然的因果關係，其间不能画一个等号。若一个人果真心机玲瓏，那么，即令他絕塵二十年，还是会冇可資言談的材料。因為有許多宇宙人生的哲理，不全是靠生活丰富、多讀書多行路所可获得的。

西洋人有圍炉夜話之雅。靠着熊熊的火光娓娓而談，这种境界，我虽未尝亲历，却是十分响往。中国各地的村夫野老，也有饭后门前納凉聊天的雅兴，却也淳朴而有土气，值得提倡。

談天必須要有一种談天的气氛。我们都有过「千言万語，不知从何处說起」的經驗，那往往是因为尚未培养出一种談天的气氛。心事重重，豈談天之时？市井喧囂，豈談天之地？最令人尷尬的是，当我们登门造訪时，既已搜索枯腸，仍復妄以打破那可诅咒的妄言的境界；我们若說「今天天气很好」，主人也許会說「可不是嗎？」結果是主人一再的倒茶，我们一杯又一杯的灌下去，至去方休。这种話不投机半句多的經驗，是够受的。

話又得說回來，世界上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为数总不会太多，逢人便坦然以肝肺相見，他既不会激賞，我們难道还要繼續对牛弹琴嗎？对人說人話，对鬼說鬼話，这是天經地义。

漫談散步

散步的好处非常的多，因此有散步癖的人也多得非常。远的像大哲康德（Kant），近的像聖雄甘地，都可称是此道中的佼佼者。

甘地每日清晨四點半鐘总要祈祷，祷告完畢，总要以愉快的心情出去散散步，风雨无间，寒暑不輟，数十年如一日。

最有趣的还是康德。康德的散步，数十年如一日，寒暑不輟，风雨无间；有一定的钟点，分秒不差；有一定的路线，毫厘不爽。据说，只有一次例外，那便是他收到一本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爱弥儿」，读得手不释卷，三天没有出门，因此才破例没有散步。康德散步的时候，总是上冠下履，穿戴齐全，口嚼烟斗，意态悠然。他有一定样子的姿态、有一定大小步伐，僕人尾随撑伞，好不威风！不过我总觉得康德那副模样倒有点儿滑稽。每次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总是会不期然地联想到玩具店里装凳条走动的玩偶。如果画一张「康德散步图」，这倒是现成的漫画题材，最适合刊在「笨拙」（Punch）杂志上。

据说小说家狄更斯（Dickens）有这么一种癖好：他常常独个儿在伦敦的大街小巷穿来穿去，走上二三十里，然后把许多地方和人物记牢，作为写小说的资料。

十九世纪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可称是个散步家。他的日常生活，离不了郊野漫步。他把散步当作一樁神圣的事。据说，他若散步多远，就能写出多长的文章；如果不让他散步，他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此外，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亦酷嗜此道。他常常回答新闻记者的问话，解释關於散步的理論与技术。

至於在中国，最先提倡散步的究为何人，迄未考据，但是知音人却必然为数不少。我还记得曾国藩曾经劝人「饭后三千步，不多一步，不少一步。」

我喜欢散步，但却未尝成癖。在我的想像中，任何一項行为，一旦成为癖好，总会有多少麻烦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癖好，他已经不再是他的生活的主人，而是生活的奴隶了。你看，当壁上的掛钟在频频催促、报告该去散步的时候，可怜的康德，即使是睡意正浓，却没有勇气违抗一个挂钟的命令；如果在途中碰着多年不见的老友，当然喜出望外，自该就座茶楼酒肆，喝它三杯两盏，暢叙别情；但是可怜的康德，却不得不说一句最煞风景的话：「抱歉得很，我不能破坏我散步的习惯。」康德所著的书的枯燥乏味，与其生活的机械刻板，我不敢说没有相当关系。据说，有嗜散步癖者，日后迁居都邑，因为市井喧嚣，万头攒动，车水马龙，不能维持散步的习惯，只好在一定的时间，上下楼梯数十回。这跟陶侃的「日运百砖」，倒是异曲同工。老实说，这种人的死心眼不由我不敬他三分。

「缓步对肚皮有好处」，这是英哲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我不知道培根对生理学有多少研究；不过人人都说散步能帮助消化、增强食欲，应该不致有大错。其实，我对此不甚了了，而亦缺乏兴趣。

散步的方式虽有种种，但总离不开以下两类：其一是把它当做一种工作；另一是把它当做一种生活艺术。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如拿它来作为锻炼身体的散步，和上述的狄更斯式的散步，都可以归为第一类，这又可名之曰功利的散步。但这不是我所欣赏的一类。我所欣赏的，乃是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散步。

散文家哈兹力特（Hazlitt）主张出游不委结伴。至于散步，我倒并不坚持不委携伴。假如有一位年青貌美的小姐表示愿意陪我走走，难道我会说「对不起，我素来是不跟人一块儿散步的」这种杀风景的话吗？那位美人儿大可以放心！我才不会这样说。哈兹力特的见解是这样：「如果你说路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許嗅不到。如果你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許是近视的，还得戴上眼镜看。」他还说：「我看不出一边走路一边谈话有什么智慧。」其实散步的妙趣又岂仅是看风景或嗅花香？哈兹力特似乎只懂得吃一样菜而不能欣赏五味调和，要不然，他一定看得出一边走路一边谈

的話有許多乐趣了。不过哈茲力特的話是有某一方面的眞理的。有伴既不見得妙，沒伴又嫌寂寞，於是有人提出一种折衷的論調：不妨帶一条狗一块散步，因为这一來，你就必須分心照拂它和对应它的言語了。帶着狗兒散步，我還沒有經驗，个中滋味，不得而知。我一向只跟人散步，从來不跟禽兽散步。

我曾經一个人儻里儻氣地走上十里八里；也曾經成羣結队地走上三五个鉅头。积多年來之經驗，归纳得一些原則：与其在人声鼎沸的閩里市井散步，不如在清秀明丽的荒村郊野散步；与其在清秀明丽的荒村郊野散步，不如在雄奇峻拔的山间水际散步；与其在笔直宽阔的康莊大道上散步，不如在曲折迂迴的羊腸小道上散步；与其在炎日当空的时分散步，不如在皓月普照的当兒散步；与其在地面上散步，不如在高於或低於地面上散步；与其单独散步，不如結伴散步；与其結同性的伴散步，不如結异性的伴散步。不过必須加上一行小小的注脚，那便是要看哪一类的同性跟哪一类的异性。

再下來似乎也應該談談「怎样散步」，因为「怎样散步」的确頗成問題。一位专家說：「最理想的步行是有节奏的。」我不曉得他所謂的「节奏」是指搖头幌脑呢，还是指扭腰摆臀？总而言之，这些論調說說倒也無妨，若是如法泡製，那就十分豈有此理了！我看見过一些人散步，这些人绷着臉、縐着眉、弯着腰、駝着背，不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神情，而且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概，好像把整个世界扛在肩膀上的样子，好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样子，这又何苦來？我不免委为他的灵魂叫屈。現代最进步的医学知識告訴我們：恶劣的情緒乃是健康的大敌。忧虑、悲伤、恐惧，为害之烈，不啻千百倍於病菌及一切物理因素。既然如此，何不暂时把不快活的事置諸脑后，換上一張笑臉，這張笑臉对人对己都有好处，至少会令人觉得不那么乖戾。有一个病人消化不良，医生劝他散步，他說確曾散步回來。医生叫他再去一次，然后給他報告，看到多少隻鴿子在第五街上空飛翔。那病人其始莫名其妙，繼而若有所悟，說道：「我去試試看。」几年之后，病人因为一些小毛病又看那医生，他說：「我至今仍在數鴿子。」这是一句富有啓示性的話，我希望它也能給你一些啓

示。

散步既有如許妙用，当你心头有着一阵莫名的煩躁的时候，何不拉个伴，劳动你的双腿和她那双玉腿，把你帶到四堵牆外的世界，和大自然合为一体呢？这时你的呼吸必更暢順，你的視野必更宽阔。如果你是个画家，你不难抓着灵感；如果你是个宗教家，你不难得得到啓示；如果你是个哲学家，你不难悟出許多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如果你是个詩人，你不难从「一粒砂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看出一个天堂。」(William Blake 的詩句)但不知怎的，我看來看去，除了紅紅的几片外，连天堂的影子也看不出來。



忙裏偷閒

在諸般生活艺术里，我特別欣賞忙里偷閒。

「又得浮生半日閒」，說這話的口氣是欣慰的。彷彿是患難餘生，在災禍这厉鬼的魔掌的罅縫溜了出來、痛定恩痛後流露出來的心聲。可見「半日閒」是多么難得。人類不幸被造物者扔到這個塵網中，就給許多俗務纏上了，忙於衣食、忙於將來的計劃；用新文藝術來說，便是忙於現實和理想。就是最妄聊的人，也還得為着妄事忙。「人生下耒就註定是忙碌的」，有推理習慣的我，很快就歸納出這個定論來。詩人叹道：「何時忘却營營」，我看他一定是被許多俗務糾纏得喘不過氣來，才咕噥出这么一句怨言，來向蒼天問罪。

半日閒既然那麼難得，退而思其次，我們還有一個法寶：忙里偷閒。

一提起忙，人們往往聯想到辛勤；一提起閒，人們往往聯想到懶散。於是忙人令人肅然起敬，閒人到處遭受難堪的白眼，這裏面冤屈不是沒有的。明朝大哲學家呂坤說得好：「為民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我願意管管閒事，替天行道，維護這第一天理。

一般人每易忽略，在忙人中，有一種懶惰的忙人；在閒人中，有一種並不懶惰的閒人。這話顯得有點離奇，似乎荒謬到可以叫人噴飯，值得不聰明的人一笑，不值得聰明的人一笑，正如說學者是天下最妄知的人一樣，教人疑心到說這話的傢伙神經是否有毛病。不過其中却大有道理在，而實在是以瘋話為偽裝的至理。就如一些名公巨卿，一天要出席若干會談、赴多少宴會、說多少言不由衷的話、接見多少妄聊的人，經常生活在繁文褥禮的束縛中，生活早經僵化，天真磨損殆盡，既談不上生活的簡化，更不足論生活的淨化了，因為其有意義的部份只剩下一点点。這種行屍走肉可名之曰懶散的忙人。在另一方面，有一種人，竟似閒散，其實他好比一副封密了的機器，教人無法窺見里面的齒輪在飛動罢了。這種人時常迸發出智慧的火花，是

为並不懶散的閒人。以上的两种人，其相异之点是显而易見的，前者心不在焉、不自覺；后者全神貫注、自覺。可見忙人未必可敬，而閒人也未必就可鄙。

懶散的忙人固不堪讚美，辛勤的忙人也不是絕對不可詬病的。理由很简单，人到底不是鐵打成的，不能持久的工作下去，他須要休息、須要養精蓄銳，好教他恢復清明的神志和充足的体力，以应付所面对的问题。我不相仗工作十个钟头比工作五个钟头更有效率。对了，阿里斯多德說：「人生的快乐起源於精力化作效率。」工作十个钟头的人，一定不比工作五个钟头的人来得快乐，因为他一部份的精力，並沒有化作效率。

如果你学会了忙里偷閒，你可以从中抽出若干零碎的时间，喝杯茶，或抽一支香烟，或散散步，或聊聊天，我敢保証这若干零碎的时间会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一定更能全神貫注，工作做得更加圓滿，覺得这世界十分可爱；否則你一定心不在焉，事事做得一塌糊塗，覺得这世界十分可厌。精於忙里偷閒这门艺术的人，一定笑口常開，覺得一切都美滿；於此道懵然的傢伙，一定精神恍惚、誠惶誠恐、患得患失，好像天就萎塌下來似的。

忙里偷閒既然發展成一门艺术，这种高超的境界，当然是不可倖致的，正如稀世的作品絕云出自不經心之理。談到忙里偷閒的艺术，張潮在幽夢影論閒与友一章說过一句极其精闢的話，深得此中三昧，理应垂諸久永，作为此道之箴言。他說：「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这話並不費解。我们的日常生活，处处受到一个时间表所支配。做学生的固然有一定的时间表，幹哪一行的，也莫不有一定的时间表。其实在已訂的时间表外，我们可以另訂一个时间表來駕馭它，两个时间表可以配合得極其恰當，而不致於衝突，問題只在於你對於每件事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而已。在学校里，用功的学生有的是；在社会上，勤於職守的人亦頗不鮮見，可是他们未必忙得出什么成績來，因为他们未必会处理之得其当，未必会抄近路。我敢說，世界上立大功、創大業、做大学问的人，都是最懂得安排时间的人。在另一方面看，可以这么解釋：当今之世，捨本逐末的人比比皆是，

这种人通常是「不务正业」的，其惯技是拉攏这个、打倒那个，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份内工作的，不知多出几倍。如果我们能够闻他们之所忙，对於忙他们之所闻，当然就绰有餘裕了。

近代工业社会，隨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一切都趨於匆忙。其实匆忙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絕非最終的目的，犯不着拿来自当偶像崇拜。君不見大都市的行人，不都是一副冒冒失失，赶着去送死的模样嗎？通常大都市里，神經病患者的人数，总与其匆忙的程度成正比，这里面不是沒有意义的。当代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有見及此，乃有为懶散讚（In Praise of Idleness）一書之问世，大声疾呼，咀咒这工业社会的通病——匆忙。約翰生博士（Dr. Samuel Johnson）有言：「勤快的目的是为了閒散，正如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張潮說：「人莫乐於閒者，非妄所事事之謂也。」可見东西方哲人都是心同此理的。不过有一种人，其閒散的程度是可以叹为观止的。据他說，那是「寧靜以致遠」。能閒散到这地步，我很怀疑那是一种福气。我们既不讚美为忙碌而忙碌，也不主張为閒散而閒散，那就只好取乎中庸之道——为忙碌而閒散了。在技术上，便是所謂忙里偷閒。

在一切的事物中，那些爭得来的、突如其来、非份內的，总比理所应得的来得美妙。「最难风雨故人来」，这种境界，就妙在它突兀，方能令人喜不自胜。要是与人预先約好了，早就知道来者是何許人和他葫蘆里装的是什么药，豈不索然寡味？正如一笔稿費，比每月的薪水更有意思。同样的，从忙中爭得一两个钟头的閒工夫，也一定远较一天半天的假日来得可爱。

散文家梁遇春先生写过一篇「『春朝』一刻值千金」，叙述他迟起的习惯，堪称忙里偷閒的专家。他說他每天早上总是尽量地滞留在床上，「看着射在被上的日光，暗笑四围人们妄謂的匆忙，細想前夜的癡夢，於是东倾西倒的小房间立刻变做一座快乐的皇宫。」你看，这种愉快，难道是一个对忙里偷閒一无所知的人所能领略得到的嗎？其实好处还多着呢！他又說，他常常在办公时间五分钟以前起床，「那时候洗脸刷牙进早餐，都表现最快的速度完成，全变做最浪漫的举

动，当牙膏四濺，臉水橫飛，一手拿着头梳，对着镜子，一面吃麵包的时候，誰会說人生沒有趣味呢？」这种况味，也不足与俗人道。

我时常想，舒适的生活固然可羨，艰苦的生活也並非不可爱；喜剧是有趣味的，悲剧也並非沒有意思。唯有单调、平板、空洞无趣的生活，才是人生的大忌。忙里偷閒的生活，是充满着戰鬥意味的生活，它是一篇史诗，記錄着一切与时间作拉鋸战的可歌可泣的史实。

忙里偷閒的生活是曲折的，有波紋的生活，它是一首詩，一幅画，虽不見得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它可以使你陶醉，發生「物我两忘」的效用；它本身是可以欣賞的，如同女人的曲线一样的可以欣賞。唯有这种生活，才是最具刺激性与冒险性的生活，才是最富於罗曼蒂克意味的生活，因为它波譎雲詭、变幻莫測。它能賜給你灵感、勇气和智慧，使你呆滯的心灵转趋活潑，使你麻木的脑筋为之復甦。



藝術家與窮

艺术家与穷之拿來相提並論，絕非偶然。一提起穷，是否令人想起艺术家則不得而知；一提起艺术家，往往令人聯想到穷，殆玄疑问。我们不妨隨便拿一百個艺术家作一个統計，就不难發現艺术家与穷的确結下不了緣。作为艺术家而能不穷，那倒是偶然了。从漫画中、从口头的描述中，我们常發覺艺术家給一般人的印象是这样：画家总是蓬首垢面、不修边幅、乱七八糟的；詩人总是瘋瘋顛顛的半个瘋子，难怪有人說：「一个詩人在历史上是神聖的，一个詩人在隔壁則是一个笑話。」总而言之，艺术家骨子里是寒酸的。叫一个銀行家和一个艺术家合拍一照，倒是頂好玩的——正是「相映成趣。」艺术家与穷，与其說是一对孿生子，毋寧說是一对怨偶。我不相仗在艺术家中，有自甘於穷者。

浪漫詩人爱倫坡(Edgar Allan Poe)具有极丰富的想像力与真挚的情感，写下許多的精美絕倫的詩篇，使他享到了文壇的殊荣，他的成就，想难加以否定了，但他一生遭际的不幸，正是艺术家与穷的一个典型的写照。爱倫坡穿的固非錦衣，吃的亦非华食，不瞞你說，他就常常弄到沒东西吃而委拿煮熟的蒲公英果腹。邻人因为不忍諱他淪為餓殍，有时給他们一些食物。爱倫坡住的是一间破陋不堪的茅屋，但他连每月三块錢的房租也無法繳付。妻子生了肺病，乞力为之延医診治，却还得在飢餓线上打滾，人生最大的痛苦，也不过是这个吧？但还有甚於此者：他那部十年心血的結晶：*The Raven* 才卖了十块錢！

談到荷兰的艺术，就不能不提到十七世紀的荷兰大画家倫勃兰(Rembrant)；如果把他的名字从中抽出，你想这部荷兰繪画史还有什么可談的呢？倫勃兰虽也曾一度享受过荣华富貴（这和他的富有的前妻有閑）但最后十几年境况之苦，可說是达到了极点。他不能不依靠繼室和兒子过活，接着兒子妻子都相繼西归，扔下穷愁潦倒、孤苦

伶仃的倫勃蘭，几乎淪到街头流浪的地步，結果鬱鬱以終其身，身后蕭条，據說比家徒四壁只好了一点——他的遺物是羊毛衣、麻衣和职业的用具。

大作曲家莫查特(Mozart)一生坎坷，亦为人所共知。莫查特住的是一间破旧的斗室，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因为慣受飢寒的侵襲，缺乏营养，結果諉伤寒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如乐圣悲多芬、作曲家伏夏克(Dvorak)和那一生只卖过三張画、最后决定飲弹以了残生的印象派大画家凡果(Van Gogh)，都有传記可資稽考。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我敢冒多事之嫌，說一句：自古艺人多貧苦。虽不足与「紅顏自古多薄命」比美，至少也不失为一份感慨。我们似乎还可以說：艺人不穷，是玄天理。

飢寒的煎熬、白眼的交投，是何滋味？恐怕大多数艺术家都能道出。「文章不值錢」是經常掛在文人口边的一句嗟叹。「一为文人，便玄足觀！」文人自己尚引以为恨，这是多么的沉痛呢？你看，在区区不經意之下，就把自卑感宣洩玄遣了。

陶渊明是孤高的，光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一点就足見此公天生一副傲骨；但在一般人一撮米都希罕的时候，未知他们的腰还直得来不？

衣食問題毕竟是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到了衣不足以蔽体、食不足以果腹的时候，所有理想都变成侈談。賴以不朽的艺术或「千古事」的文章当然就在所不計了。人究非不吃人间煙火的神仙，风不可餐，露不能飲，成仙既然玄望，就只好先去求得溫飽再說了。

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有例外，靠几根画笔、一副嗓子發財，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实在也不乏人。画家毕卡索隨便塗几笔便能卖几万鎊；據說邱吉爾的稿費之昂，竟达一字一美金之鉅，这简直羨煞滿身寒酸味的文人，但世上到底找不到第二个邱吉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話我想不会錯到那里去，做乞丐的也可希望成为乞丐头的一天。

如果艺术家的穷是活該的話，所有艺术院理应令其停办，大学里

的中外文系，单单教些高級应用文就算了事，倒也痛快；不然，製造一批批潦倒的人，讓他們到社会上去受罪，豈不悖乎人道？

什么事都有它的前因后果，艺术家与穷之分不闻毕竟是目前的事实，既有这样的事实就值得去研究癥結之所在，因为人穷可令志短。志短非同小可。一个人志短，这个人便空虚；一个民族志短，这个民族便完蛋。貧穷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問題，艺术家与穷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則大問題也就得到部份的答案了。

其实，艺术家對於我们的社会多少是有用处的，要不然，他們便死去，何足同情，何足掛齒？固然人们可以过着微声逐色的生活，人们也可以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甚至人们还可以过着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換句話說，即使沒有艺术，我们也一样可以生存。可是如果人人都志在溫飽的話，那倒省事；不幸人们在溫飽之餘，偏偏要追求所謂幸福而有意義的生活，遂使天下平添不少事兒。沉浸的艺术的环境中，不見得就是幸福的生活，但捨艺术而談幸福的生活，必成不着边际之談，这就得涉及「艺术与人生」了，而艺术於人生之重要，尽有許多专書供給我们圓滿的解答，在这里申述是多餘的。空論如何，我們已經追出「艺术家的穷並非活該」的結論了。

既然我們認為在衣不足以蔽体、食不足以果腹的时候，一切理想都成為侈談，那么在忙於衣食的当兒，要一般人去风雅，似乎有点不識时务；艺术万能的高調，着实有点肉麻。不过有一点是万万不可忽略的：縱使衣食問題很伤脑筋，也还須要接近一点艺术；正如經過許多挫折后更应保留下一点理想一样；否則在恶性循环之下，人类的心靈必陷於进退維谷的状态中，心灵陷於进退維谷，我以為是一切悲剧之最甚者。艺术家吃香則世治，艺术家不吃香則世乱，这种結論我不敢下，不过艺术家有出路，多少可以反映时代之有出路。如果人人都了解这道理，就曉得去热爱艺术，艺术家就不患空出路，这一來，艺术家与穷，必将成为陈跡了。

我想艺术家的任务除了努力創作外，尚应旁及教育和提倡。这个責任，捨艺术家而外，又有誰去担负呢？

如果穷是可以預防的話，我一条补救之道以便对症下药，應該是

急不容緩的事。我讀過一篇論貧窮的專文，它把貧窮的原因歸納成十數項，可分為內在的（譬如天生低能）與外在的（譬如惡劣的環境）兩類，在那些內在的原因之中，我看來看去，比較上與藝術家有關的只有一點，那便是性情乖僻。當然我不便一口咬定藝術家便一定性情乖僻，但性情乖僻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頗不鮮見。就拿前面的例子來說罷，愛倫坡縱酒放蕩、倫勃蘭不善理財、悲多芬性情暴戾、凡果态度浮躁，都是明証。

人是社會動物，社會又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密切關係而產生，妄想與社會融洽，務必革除乖僻的習性；要不然，形成一個「封蔽的自我」，只有處處碰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雖求得一時的痛快，或可傳為美談，也只是給芸苑多添一些掌故而已，其奈得不償失何？

孔老夫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三千門徒中，獨讚顏回之妄得，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可見這老头對「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身外物，並不看得很重。的確，簡朴的生活是合理的生活。藝術家能够「樂此」，就一定能够「不疲」。雖然舒適的生活的追求，原屬妄可厚非，但我們應該記得聖經的一句話：「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孔還妄困難。」說「文章不值錢，才华乏人知」之前，最好能客觀地估價一番，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值得傳誦？才氣是否縱橫？如果不是，那麼既怨不得天，也尤不得人，只好力求作品的完美無瑕了；如果是，那麼文章又何患乏人賞，才华又何患乏人知呢？即令還是乏人賞亦乏人知，那是絕對值得同情的；不過還是不妄緊，正如法國詩人梵樂希（Paul Valery）所云：「詩人在想像中，償還了上帝對他的不公。」

書・讀書

書呆子有很多事情不配置喙，尙配置喙的恐怕只有書。書，我所欲也；讀書，亦我所欲也。二者尙可得兼，所以我既不斷地買書，亦不斷地讀書。真的，我之於書，如果說是若即若離，那就嫌太輕描淡寫了，應該說是難捨難分。因为我之嗜讀，雖不致於達到焚膏油以繼晷的地步，可是廢寢忘食，却是常有的現象。如果我不願意撒謊的話，我得說，除了很少的例外，我几乎沒有一天不看書。可是如果你稍有一点逻辑脾气的話，你就不會對我說：所以你的學問很大。不然，你就錯到亞比西尼亞去了。書在我的生活中不仅是其一部份，而且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如果說我還不配談談書，我那裏服氣？可是如果說我可以給你提供一些治學門徑或讀書經驗什么的，我又那裏敢當？說真的，一個充滿着缺憾的人生，我不是不能想像的，但一個缺少了書的人生，我覺得的确不可想像，猶之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太陽的世界。

一般地說，書總是可愛的，看了叫人開心；略一翻閱，叫人更開心；沉浸其中，叫人格外開心。所以對於書痴來說，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彼不減其樂，不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他有豐富的藏書。

據說有人在婚禮甫畢，正欲度其蜜月旅行，但当他一想到自己收藏的許多心愛的書，不便攜帶在身的時候，便廢然而止。后来他的太太有沒有跟他大哭大鬧，我們且別管它，但是愛書愛到這種地步，能不令人肅然？愛書既能成癖，难怪英史家馬考萊（Macaulay）也說：「與其做一個國王而不知道愛好讀書，我寧可做一個窮人，居於陋巷，而擁有極豐富的藏書。」原來在「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一格之外，還有「不愛江山愛典籍」的一格。我從來就沒有考慮過「如果我是一個富翁，我將如何如何」這一個問題，不過老天如果真的不許我不做富翁，那末有一件事情我絕對會毫不猶豫，甚且急不欲待地去做：我將在我的每一座寓所、每一座別墅、每一艘遊艇、每一架私用航

机、每一部轿车，都設置应有尽有的好書。

然則，讀書之乐，乐如何？当然，「夜伴孤灯，强睜睡眼，历重重考試，鑽层层疑难，讀書，所得的未必是乐；然而博覽羣籍，与古今中外圣賢学者交晤，不出门知天下事，讀書，該又是一件多么令人称心的快事。」●試想，一卷在手，一盞在側，既足消我永昼而有餘，夫復何求？这时节，我时而击节称賞、时而拍案叫絕、时而作会心的微笑。旁人固然可以当我神经病，然而他敢问心妄愧地說这种如痴的妙境，他一点也不响往嗎？魚相忘於江湖，讀者則相忘於卷帙的世界中——一个最不真实，却又是最真实的世界。於是吾眼界为之开朗、茅塞为之頓開，於是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於是吾經驗到一种玄以言喻的「聞道」的喜悅。这是一种什么味兒的喜悅呢？却又「欲辨已忘言」。「朝聞道，夕死可矣。」闻道既足以令人覺得死而妄憾，它所能給我们的滿足之巨，亦可概見矣，虽然吾闻了道还是不想死。

如果沒有人提出抗議，我将妄把自己喚作「愛書者」(book-lover)；如果有人提出抗議，那末去他的，我还是一样的妄把自己喚作「愛書者」。我是一个「愛書者」，然而我絕不是一个「書籍的盲目崇拜者」。我的艺术氣質固然不許我对書籍作盲目的崇拜，我的逻辑脾气又豈容我为此？也不妨这么說：我对書之爱，乃是一种「理智的爱」。「理智的爱」，乃是一种不因为爱而混淆了是非的爱。不混淆是非的爱，正是不姑息的爱。不姑息的爱，使吾法苟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对書的看法。霍桑說他一看見了裝訂成冊的書，总是肃然起敬，因为「書不論新旧，都藏有天方夜譚里『芝麻开门』那样的咒語，它替你打開意想不到的真理的洞穴，把秘藏的珍宝展示在你的跟前。」这話显然不是全然正确的，可是如果把「書」的字样换成「有些書」，那就不会錯得太离譖了。比这个更露骨的看法不是沒有的。譬如塞万提斯在「吉訶德先生」中就說过：「任何坏書，都会有些好处。」美国作家賀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說：「一本坏書，就像一艘有漏洞的船，在智慧的大海中航行，总会有些智慧从漏洞中流进去的。」換言之：書玄不好。如果这真是事实，該多好啊。我恨不得它会成为事实，然而不幸这种「書卷玄失

論」是沒有多少事實的根據的。

和以上态度玄獨而有偶的，便是「開卷有益」的說法。其實「開卷有益」的真實性实在是太成問題了，尤其是在廿世紀七十年代，印刷術這樣發達的今天。蓋「開卷有益」之為真，必須同時滿足下列的兩個條件：

一、任何一本書只會給我們好處，不會給我們壞處；

二、讀者皆具備充份吸收書卷的內容的能力。

而事實上，第一個條件能否滿足，已經頗成問題了，遑論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你不須委很聰明，便知道它是多么的荒謬。我們一跑進書店裡，目光馬上接觸到琳瑯滿目的書。這裡面究竟有多少值得一讀，那就太難說了。恐怕絕大多數，只是徒具書的形式而不配叫做書的書。很顯然的，這些書（姑稱之為書），絕難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它們不但將與草木同朽，而且亦將與它的作者同朽。世界上之有混賬的書是不足怪的，足怪的是那些混賬的書的作者居然還不臉紅。古之作者，雖未必在智慧上比我們高明，尤未必在知識上勝我們一籌，然而文章既是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是得是失？寸心了然，成書既是如此之困難，刻書又是如彼之不易，所以他們雖不見得都不惊人死不休，但至少在下筆為文的時候，態度便比較嚴謹。「一言足以喪邦」，他們又豈忍見喪邦之言，從自己的筆下輕輕溜出來呢？今則不然！現在印刷術是這樣的發達，白紙上印滿黑字而裝訂成冊的便叫做書，又很少有人提出正名的抗議，玄怪乎書卷如林，作者輩出。於是張三固然是「文豪」，李四亦不失為「作家」，彷彿狂飆運動，又再度的掀起；文艺中興，又再度的降臨。其實真是天曉得。

誠然，書也者，品類繁多。我們能讀到的亦不尽是壞書。有些書使你一見鍾情；有些書使你一見如故；有些書「不打不相識」，始而味同嚼蜡，繼則甘之如飴；有些書一覽玄遺，了玄餘味；有些書叫人掩卷太息；有些書令人擇卷三歎；有些書叫你怒从心上起；有些書甚至叫人惡從胆邊生；有些書讀之玄味，棄之並不可惜；有些書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一旦得見，果然不差；有些書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一旦得見，不過爾爾！有些書看完一遍後，你仍想再看一遍；有些書

看完一遍后你就不想再看一遍；有些書還沒有看完一遍时，你已經懨懨欲睡，胃口倒尽，根本不想終卷了；有些書只有開头差堪一讀；有些書只有中段差堪一讀；有些書只有末段差堪一讀；有些書只有書名尚堪一讀；有些書连書名也不忍卒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書之不同，亦各如其封面。

或曰：在林林总总的坏書之外，既然还有这么多不厌百回讀的好書，而以有涯之生，逐玄涯之知，好書已經太够我们受用了，根本玄由遍讀，至於那些坏書，別理它好了，亦何憾之有哉？話是不錯的，沒有人强迫我们讀坏書，而我们也似乎不忍强迫自己受苦受难地去讀坏書，其奈魚目混珠何？使我们懊恼的不是存在着坏書，使我们懊恼的是，我们不得不浪費許多冤枉的精神和时间，去分辨出哪一本是好書，哪一本是坏書。何况敗絮其中的，又往往金玉其外，有时居然可以乱真；更何况我们往往委冒一种危险，那便是「談坏詩書」，談了坏書而不自知，那时再回头已百年身了。我不是說它居然明目張胆地誨淫誨盜，而是說它使人失去人性。君不見很多談坏詩書的傢伙，一開口便是仁、義、道、德，再開口又是性、命、理、氣，道的尽是非常道的道，一股酸腐之气，扑面而来，令人恨不得落荒而逃，恨不得尚未降生。这种人我們應該引以为殷鑑。不得不和坏書晤对，这也是作为一个讀者的一种悲哀。

其实談之令人懨懨欲睡的書，也未必一玄是处，至少它有这么一个功用：催眠。更坏的是那些叫人边談边咒罵的書，如果一本書廢話连篇，不知所云，滿嘴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讀者固然看不懂，作者也未必看得懂，那就頗有資格被归到「叫人边談边咒罵」的一类了。

世间上有一种人，尽管他自己不懂得某一种学问，亦玄碍他恬不知恥地大談那种学问，使你对他往好的方面誤会，以为他真有两下子，如果此輩仁兄仅止於談，那末受害的範圍就不超出其声浪所及的圈子以外。不幸此輩仁兄每不止於談，还勤於舞文弄墨，著書立說，遂令受害的範圍益加擴大，而本末就不幸的讀者，現在就更加不幸了。妾知道：文飾的玄知劣於赤裸裸的玄知。書之为灾，莫此之甚。

對於那些高深莫測的書，人们往往容易肅然起敬而加以膜拜，以

为在那硬皮燙金的封面之下，必定是些深奥的大道理，觉得自己看不懂，是程度不够，应该怪责的是自己。於是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越看不懂，那本书就越深奥，自惭形穢的心理於茲衍生，而那些艰涩的书的高深莫测的权威，便是基於这种社会心理而建立起來。殊不知其莫测高深，有时除了說明該書的莫名其妙之外，往往並不說明什么。真，未必莫测高深；莫测高深，未必真。而看不懂，不应该記在我们的賬上，却應該記在作者的賬上；其咎不在我们，而在作者。妾知道：一个连話都說不清楚的人沒有权怪人家程度不够。因此你如果因为看不懂而低估自己的聪明才智，你就錯怪自己了，而你对罪无可赦的作者就太寬大了。

有一个时期，我对那些艰涩难懂，像文字魔术似的「大書」，也曾兴起过「高攀」之念，也曾自勉自励，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妄畏的精神，焦头烂額地啃了許多高深莫测的「大書」。后来幸而良心發現，絕眼不看那些像煞有介事、实則不知所云、毫無意义的梦囈似的「符籤」，从那时起，我頓時觉得世界清爽多了。我敢說，我的学问的进步（如果有的話），實始於我告別那些混賬的「大書」。

在許許多多的运动中，至少有一种运动似乎倡导乏人，沒有受到应有的重視，那便是「多产作家的节育运动」。我常想：若沒有人强迫我们献醜，我们尚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藏拙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时我甚至偏激到覺得秦始皇的焚書，未始不可以是一种德政；在怒从心上起的时候，总覺得解决那些弃之並不可惜的書的最好办法，便是乾脆給它一把「秦火」。

可是你也不必耽心那些糟不可言的書沒有讀者。否！他们所拥有的讀者之众，往往出乎你意料之外，适足以令那些該死的作者自我陶醉而有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那些讀者大多数是「半票讀者」。正是：有什么样子的作者，便有什么样子的讀者。據說英國的讀書界有这么一种怪現象：凡是經過权威批評家評介推荐的書，往往是在銷路上慘不忍睹的書；而經其「春秋之笔」所笔削的書，却往往銷路奇佳。其实如果明白「有什么样子的作者，便有什么样子的讀者」这个道理的話，你就会了然：所謂「怪現象」也者，就

只是少見多怪罢了。妾知道：票房价值絕異於艺术价值。貝多芬不朽的交响曲，尙蒙某教授「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之讥，曲高而不和寡，其可得乎？其可得乎？

君子有所不談。盖有所不談，斯可以有所談。作为一个时间上的穷人的我，选择焉能不慎？分阴是競，乃势所必然。那点得末相当費工夫的可怜的餘暇，实在經不起浪費，縱然任性而談是有趣的，又豈能容我为之？选择既不可不慎，所以在决定買下一本書之前，总不免东挑西剔、斤斤計較。廢話连篇的，不收；人云亦云的，不收；玄之又玄的，不收；仗不仗由你的，亦不收。剩下末可以在我的書架上佔一席位的就不多，除非是那些言之有物的，文采斐然的，持之有故的，言之成理的，或者是不由你不仗的。一言以蔽之：食不厌精，膾不厌細。以条件苛严，故庋藏不富。而基於上述的原則，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繼絕学，为万世開太平的「载道」之篇，未必能够受到我的宠幸；而那些被道学先生視為「奇技淫巧」的著作，却往往成为我的上宾。不过也有例外。一本荒誕不經的書，偶然也未始不可以破例「忝陪末座」。有时我也会把一本明知的劣作買了下末。譬如我现在正在写一篇關於書与讀書的文章，而一个該死的作者也談到書，那么他那本混賬的東西就不免令我破一次鉗，而那个該死的作者就乞緣乞故地叨了一次的光。我倒妾看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高見」。

这样說来，坏書也自有它的价值囉？然。它可用以磨利我们那把思想的刀子。同时，如果你尚未丧失你的幽默感，那末你往往可以發現，一本糟不可言的書，往往就是一本妙不可言的書，故亦未尝不可藉以养性怡情，因为它有时简直是一本令人噴飯的笑話大全。不过还得声明的是：除非我们具备起碼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否则說妾「磨利我们那把思想的刀子」，又打哪兒說起呢？不被它蠱惑，不被它弄糊塗，已經是十分难得了。

「張三的大肉許是李四的砒霜」❷，仗然。口之於味，未必有同嗜。一本我以为不可不談的奇書，也許在別人的眼中，竟是味同嚼蜡，妾他硬着头皮談下去，简直是一种刑罰；而一本別人以为趣味盎

然的書，在我看來，却往往是集膚淺和幼稚的大成。之所以如此，固多端也，其肇肇大者，曰決於學養，曰決於品味，曰決於氣質。既然如此，從一個人所愛讀的書的性質、類別和作者中，就略可窺見一個人的學養、品味和氣質。比方說，如果你的 **favourite author** 是李敖、殷海光，那麼我願向你伸出一隻友誼的手，因為我們「於味有同嗜」；如果你的 **favourite author** 是義和團主義玄學鬼，那麼我們還能談得攏才怪。

就性質和門類而言，恐怕惟有用這麼一個字來形容我的藏書：雜。我的書的性質之雜，亦可謂叹為觀止。論作者則屈子與莎氏來陳，究門類則逻辑與詩文並列。我慶幸自己不斷的購買「閒書」，亦不斷的閱讀「閒書」。如果有誰希望治癒他的言語空乏，我倒可以給他一條藥方：多讀閒書。而我若略有些三教九流的學問和野狐禪的認見，亦不得不歸功或歸罪於我之不斷閱讀閒書。但是我也沒有我不必與人相同的怪脾氣。

我常有一種傾向，就是拿一本書的可讀 (**readable**) 與否來決定好惡，明知這種態度常不免有失公允，容易令那些質勝於文的巨著，得不到應得的敬意，奈何先入之見既成，因循之習遂生。我常常想，那些「飽學的蠢才」 (**learned fool**) 如果能在雕虫小技上用點功夫，那麼對於那些可憐的讀者的痛苦的減除，是頗有貢獻的。

一些女人除了小說之外，什麼都不讀。我恰相反，除了小說之外，什麼都讀。不過因為我亦略知貪多務博之弊，故近來也略知所節制，因此「什麼」的範圍，就越來越小了。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不但沒有讀過萬卷，而且常常沒有讀破，怪我揮起我的「如椽巨筆」（言其重也）來，總不覺得有神，有時簡直覺得有鬼。「書到用時方恨少」，我還沒有用時，就恨少了。

有些人愛書，可是不一定愛讀書。他們坐擁書城，面對着五色繽紛的卷帙，亦頗能自得其樂。瀏覽之不足，撫之摸之；摸之不足，捧之嗅之，頗有南面王不易之概。對這些人，我稱羨之餘，總不免替那些書卷叫屈。這種人嚴格的說，只能算是收藏家。寢饋其間的，却是

書蠹。当然，書是可以「玩」的，資深的書呆子类皆兼而「玩」之。李敖先生十多岁时就有一手絕技：能够闭着眼睛，凭鼻子辨别出那是一本什么書局出版的書。若非「玩書家」，焉能致此？書这东西，其物質本身便是一种美。有艺术氣質的我，那里肯轻轻地放过把玩的机会？我之「玩」書，本从書的封面、排版、目錄、插图、色泽，一直到那「怪好闻的帋香和油墨味」。然而玩物既可以喪志，所以在把玩之餘，我尙不忍不急不欲待地啃下去。

比之淹博大史家艾克吞爵士(Lord Acton)之談万卷書^四，我虽望塵莫及，不可同日而語，然尙差堪自慰的是，我尙不致於束書不觀，游談玄根。因此我和胡适之先生至少在这一点上，态度是相同的，那便是不大計較版本。珍本固然可談，普及本亦不更詰屈聱牙。書既是一种工具，最重要的是白帋上面的黑字。如果一定妥「玩」書，那么行有餘力，方宜「玩」之。然而一旦不同的版本有着不同的「白帋上的黑字」，而这不同的「白帋上的黑字」又關係重大，这时我们對於版本，是应当講究的。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不講究版本的胡适之先生，在他研究「水經注」的时候，也还不憚其煩地在各地报章遍登啓事，以蒐求各种不同版本的「水經注」。

我也爱把書借給朋友，只是他必須是个善讀者。因为奇文共欣賞，可以共我乐；疑义相与析，可以解我惑。大家經常閱讀一些相同的書籍，往往談得更有兴味，不管見解一致还是相左。可是有些人，你如果把書借給他，你就很难不后悔。可惡的不是他久借不还，可惡的是他会矢口否認曾經借过你的書。

讀書而期有得，先决的条件之一似乎是心定，你要是能够像老僧入定那样的定法，那末你真是得天独厚；若一刻不能定，那末你真是得天独厚。几曾見到心不能定而尙能卓然成家的呢？盖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我既妄力在深山野嶺中設置書室，那么图书馆似乎是一个比较能够得到定的所在。图书馆对我來說，确是个圣地，因为在图书馆里，触目皆是浩繁的卷帙，虔敬之心遂油然而生，我又不期然地兴起「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感慨，頓時覺得自己彷彿矮了几吋。在知識的滄海里，自己又

何及於一粟！这时，那股不可救药的狂傲之气，竟霍然而癒，不知消匿到那里去了。我敢說，在圖書館那段时光，是我最谦卑的一段时光。所以說圖書館其实也是一个診療所，它可以治療一个人的狂傲。

可是說也奇怪，由於圖書館对我尚有另一种相反而並不相成的作用，使我覺得圖書館里的誘惑实在太大，它似乎不是一个令人「六根清淨」的地方。若非有「柳下惠的工夫」，实在不容易「坐怀不乱」。用志既紛，自難凝神。可別誤會，以为我指的是圖書館里的如花似玉太多，以至令我分心。非也！那又指什么呢？原来寡人有疾：寡人愛書。往往，我一看到那紅紅綠綠、五光十色的典籍，就不免見猎心喜，犹如一个老饕面对着滿席的美味珍饈、山珍海錯，馬上食指大动，恨不得大快朵頤。於是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从天文翻到地理，从中菜食譜翻到西菜食譜。这样地就溺下去，一發不可收拾，於是几个宝贵的鉗头，又轻轻地溜走了。圖書館对我，就是这么一个既爱去又怕去的地方。

「你何不說說讀書的方法呢？」也許有热心人会給我这样的一个建議。可是抱歉得很！一个野狐禪的讀者还能給你提供些什么方法呢？只是我劝你不妄採取一种「为快而快」的讀法。一些有助人热情的科学家，每劝人讀書要講求速度。他们还介紹給讀者一种「跳」的讀法：教你視線先停驻在一个单位上，咀嚼不可以动，不可以唸出聲音，亦不可以默讀，必須同时看到这单位的每一个字，尤不可以視線逐渐移动，必須「跳」。如此訓練有素，你就能够一目十行了。科学家的話自然不会沒有相当的根据，可是从「阅读之艺术」的觀点来看，讀書，在乎細細咀嚼，以期深入的体味。这种讀而不知其味的讀法，真是不解风情、不識风雅，何异牛啃牡丹？又豈足为訓哉？

一个积四十年之經驗的圖書館学专家蒋復璁先生，从他对於一般学而有成的讀書人的長期精密的觀察，再加上他自己一辈子可貴的讀書心得，归纳出一套訣竅，以供那些希望学而有成的讀者参考，曰：讀書的「三姿」「三不」。所謂「三姿」，是說姿坐、姿記、姿查。所謂「三不」，則是不翻、不換、不停。以这样的標準来看我的讀書，不怕我沒有一項能够合標準。而一个个性尚未泯滅的人，很难不

在他讀書的時候表現出他的個性，也就懶得計較什麼標準不標準了。譬如他說讀書應當正襟危坐，我則不拘形迹，坐着固然可以讀書，躺着也可以讀書，甚至蹲着（如廁時），站着，亦未始不可以讀書。試想：像這樣的一個十足的野狐禪讀者，還能在「讀書的方法」這個大題目之下，給你些什么指導呢？

〔註〕●這幾句話引自趙光裕的「苦學成功的胡良珍博士」一文，而略有改动。不敢掠美，故誌之。●「讀壞詩書」是一句廣東話。「壞」字並不是「詩書」二字的形容詞。「讀壞詩書」，意謂讀詩書而變壞。●即英諺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據說艾克吞爵士真的讀過上萬冊的書。而「萬」字，不是泛指其多而已。



論藝術的風格

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評論，應該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作品的深度，另一方面是作品的风格。前者在原則上是可以衡量的，后者就严格的意义來說，是无法衡量的；前者相对的，后者是絕對的。

然而「风格」这一个概念，究竟有些什么指謂呢？恐怕就不太容易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一般經常为人所使用的字眼，往往不是最容易了解的字眼，因此在这里，我们就「风格」一詞先作一番分析，不仅不是多餘，而且是必須的。

「风格」一詞，我们都承認是英文 **style** 的译名。在中文里，这个名詞的使用，始見於刘勰文心雕龙說对篇，文心雕龙里面还有几个名称，如体性、风骨，与所謂风格，其意相通。曹子桓典論論文所謂「气」，其意亦相近似。唐人司空图論詩，虽未明言风格，但所标的二十四品，其实就是廿四种风格的类型。可見古来文評家早已經运用了风格的觀念了。明清两代李东阳、沈德潛有作家「各有独特之风格，不相杂厕」之語，此处所謂风格，与現代风格的意义，相去亦不为远。可見中土学者評文論艺，不管是明言或暗指，总是經常运用风格一个觀念。至於西方，风格一詞的使用，亦頗不鮮見。早在紀元之始，拉丁修辞家塞尼格(*Seneque*)就說过「风格是灵魂的全兒」与「作家的风格与其生活相彷彿」这些話。法国自然学者布丰(*Buffon* 1707-1788)說：「风格就是那人自己。」「风格也者，乃是作家个人的特产，不是随时可以运移的。」叔本华說：「风格是心的面兒。」紐曼(*John Henry Newman*)說：「如果风格可以說是屬於他本人以外的什么的話，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这个人的影子就是他的风格，风格犹如影子一样跟隨着他。」像这类有闇风格的話，还可以找到很多，我们也无法繁徵博引。把諸如此类的說法綜合起来，並參照在行文中，一般作者对「风格」一詞的用法，再捨弃各种說法的「小异」，就不难窺見其「大同」。这个「大同」就是：风格是艺术家的反

映，这种反映，足使其艺术品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从这个「大同」着手，我们可以下这么一个定义：

「一个艺术家，由於惯常运用一系列特有的表达方式或手法（在繪画是表現在线条、色彩、構图等方面，在文学則表現在結構、措辞、笔調等方面），这些特殊的方式或手法，使他的作品显得与他人迥然有异，成为这个艺术家特有的标誌，这种特有的标誌，我们把它叫做『风格』。」

語言的用法是約定俗成的，我们定义則是就俗成而約定。因此，少数作家对风格一詞，容或賦予特別的意义，如福樓拜(Flaubert)以为正确的用字就是风格，这种說法，显然不是約定俗成的說法，我们固然不能干涉他用字的自由，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他。

到这里，我们且研究一种說法，那就是「风格即人」。这种說法，肯定艺术家本身的質素决定其作品的特色；換言之：作品的风格跟艺术家的人格有着必然的關係。典論論文就有这种論調：「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濁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徐幹时有齐气」文心雕龙体兴篇說得更清楚：「賈生俊發，故文潔而体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淑儼，故响逸而調遠；叔夜携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癮而韶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触类以推，表里必符，豈自然之恆資，才气之大略哉？」这意思显然是承認作家的个性或本身的質素就是其风格的因。这种說法，到底有多少真理，我们似乎不好貿然論斷，除非我们能够找到相仗的理由，不然也沒有迷仗的必妥。其实风格，按照我们的定义，是作品所表現的特殊方式或手法；而人格，却是人的氣質，两者各自隸属不同的範疇，已經是风馬牛不相及了，两者又有什么相干？如果一定妥說相干，那么論者必須把人格加以分类，然后把风格加以分类，然后用統計的方法，看看某一类型人格的艺术家，是否必定具有某一类型的风格。这样，即使不言之成理，至少也持之有故。然而，持「风格即人」論者，似乎未曾

做过这种工作，首先他们已經不能持之有故了，能否言之成理，也十分渺茫。再說，这种工作，原則上是不可能做的，因为风格是艺术家的产物，风格究竟有多少种类型，根本就沒有定数。未出現莫奈 (Monet) 馬奈 (Manet) 之前，繪画的天地里根本就沒有印象派画风；未出現爵士乐的作曲家之前，音乐的天地里根本就沒有爵士乐的韻味；未出現哥德式 (Goethic) 建筑物設計师之前，建筑的天地里根本就沒有哥德式的情調。在文学、雕塑、舞蹈、戏剧方面，情形亦玄二致。总而言之，风格的类型是一个变数，明天的风格的类型，必定多过今天的风格的类型。我们不能想像一个世紀以后的画风。如果你肯定一个神經質的画家必定有某一种风格，你也沒有理由肯定百年之后，一个神經質的画家必定仍表現那样一种风格，因为你先已不能想像那时可能有的画风。承认人的气质完全地决定风格，玄异承认风格的类型不能隨時日而增多。可見持「风格即人」論者不可能持之有故了。他们既然不能持之有故，我们是否还有固执「风格即人」这个仗念的必要呢？

「人格」一詞，在中文里至少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人所具备的气质的总和。譬如内向、外向、好靜、好动，便是構成人格的气质。这种意义的「人格」，是 *personality* 为译名，原本是心理学上的用語；另一种則包含倫理价值的意义。譬如一个悲天悯人，仁人爱物，循規蹈矩的人，我们誉之为「有人格」；一个多行不义的人，我们毁之为「无人格」。这里「人格」一詞的用法，就包含倫理价值的意义。这一来，如果說「风格即是人格」，由于「人格」一詞有歧义 (*ambiguous*)，这句話也有两种解釋。第一种解釋是：人的气质决定其风格；第二种解釋是：人的道德修养决定其风格。前面所作的批评，即是針對第一种解釋而言。但是有些論者坚持第二种解釋，他们以为欲使作品具有特殊的风格，务必修养自身高尚的人格，玄异把道德修养和艺术手法所表現的特色混为一談。这种論調，也不見得妥当。这种論調的支持者，既然沒有做那种統計、归纳的工作，故亦未能持之有故。順着他们的說法推論下去，那么具有特殊风格的艺术家，就捨道学家莫属了。然而在德性上最有修养的人，是否都是最能具备特

殊风格的艺术家呢？相仗大家自有答案，不必由我哓舌了。这种論調，似乎頗難言之成理。玄論如何，我们找不到逻辑上的理由，說风格和人格有着必然的關係。再說，我们还可以找到許多例証，說明风格和人格之间，每有着頗遙远的距离。塞尚(Cezanne)在繪画上是个革命者，然其气质却极和平；迭加(Degas)和雷那亞(Renoir)两个画家在作品里充份表現肉感，但在实际生活上，却相当严肃；巴爾札克描写悭吝一端最为成功，其实际生活却极挥霍。証以中土文士，则风格和人格不一致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楊雄法言摹拟論語，本屬矫揉造作，豈是由衷之言；刘向玄行，而其遂初賦自比孔子，其风格何足以代表其人格呢？可見一些視為固常(taken for granted)的觀念，未必都能站得住脚。总而言之，若說人的气质对作品往往有某种影响力或者可以；若說艺术家的人格，完全地决定了他的风格，則不行。

风格的意义，风格和人的气质的關係，我们大致談过了，但是风格究竟重妥不重妥呢？如果重妥，又爲什么重妥？似乎也應該談談。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风格對於艺术作品十分重妥。进一步的說：具明显风格的作品未必是好的作品，但是沒有明显风格的作品必不是可貴的作品。这道理並沒有什么玄妙。风格既是表現出作品的独特性的标誌，有风格便有独特性，沒有风格便沒有独特性。沒有独特性的作品，必定是一种因襲，一种模仿。它的好处，在别的作品找得到；别的作品的好处，在它里面找不到。严格地說，一切有风格的作品始可謂之創作；一切称得上創作的作品，都應該有风格，要不然这「創」兩字将作何解釋？在艺术的天地里，多了一种风格，便增一分光彩，因为多了一样独一无二的东西；少一种风格，艺术天地永远有不可補偿的欠缺，因为少了一样独一无二的東西。这样的艺术天地，不是适才的艺术天地。我们一闹头就說，一件作品的风格，形成他絕對的价值，便是因为这个緣故。

我是之故，作为一个艺术家，絕不可以沒有风格。但仅仅具有风格还是不够，他必須有「风格的自覺」。「风格的自覺」这个名目原是笔者杜撰的，这是笔者所提出的一个觀念。所謂「自覺」，顧名思

义，是「不自觉」的反面；相对於「风格的自觉」的情形，有「风格的不自觉」。「风格的不自觉」，就是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风格。这包括好几方面，包括不能明确地指認自己的风格，不能分析自己的风格，不能發展、或培养自己的风格，不能批評自己的风格，對於自己的风格，既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所其当然。这样的艺术家，虽然不能說沒有风格，但是他之所以有风格，完全是出於妄意識的，犹如有些人虽然說了几十年的話，但對於語言本身，却未必有充分的了解。这絕不是空泛妄根之談，更不是妄的放矢之論。徵諸实际情形，我们不难找到說明。許多艺术作品，不管是繪画、文艺或音乐，我们都能体会出其中的风味，能指認出其中的独特性，但除此之外，我们不能从該作者的其他作品中，体会出更多的风味，指認出更多的独特性。这一类的画家习於使用某种調子的色彩，习於構作某种韻致的线条，习於組織某种形式的图面；这一类的作家习於运用某些修辞的技巧，习於安排某些意象的組成，习於某种句法、篇章或段落的組織，他们的确有自己的面兒，只是沒有許多各不相同的面兒。所謂「风格的自觉」，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风格，能够确指、分析、批評、發展、並且超越自己的风格，使自己的作品不但有这么一面，此外还有其他許多面。他永远有新的面目与人相見，使人有仰之弥高、高深莫测之感。一个艺术家是否堪称伟大，其中一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风格的自觉。毕卡索不但能創出一种画风，还能創出許多崭新的画风；贝多芬不但能譜出气撼山河的交响乐，还能作纏綿幽婉、柔情似水的抒情曲；莎士比亚不但能写悲剧，还能写喜剧，更能写优美的十四行詩。

风格的自觉，對於一个已經登堂入室的艺术家，更形重妥，因为一个已經登堂入室的艺术家，总有他一套看家本領，他對於种种技巧的把握，都非常稔熟，然而他往往缺乏一种反省，往往泥於自己那套看家本領。也許他对种种技巧的运用，就像一举手一投足那样，固属运用自如，然而只是一种机械的程序，已經不是心灵的活动了。一个会走路的人是不容易注意到走路本身的。有些艺术家达到某种境界以后，總不能超越那种境界，主要是因为他缺乏风格的自觉。

风格的自觉，可称是一种态度。就像科学的精神是一切科学家所必备的态度一样，风格的自觉，是一切艺术家所必备的态度。



風格的自覺

——藝術家得救的起點

在談文論艺的文字里面，我们时常会碰到一个被滥用、甚至被誤用的字眼：风格。那末「风格」一詞，究竟又有些什么指謂呢？那就可謂人言人殊、众說紛紜、莫衷一是了。不过依我这个沒有「談玄癖」的人看來，风格云云，其內涵不外这样：

「一个艺术家由於慣常运用一系列特有的表达方式或手法（在繪画是表現在線条、笔触、色彩、構图等方面，在文学則表現在結構、措辞、笔調等方面），这些特殊的方式或手法，使他的作品显得与他人迥然有异，成为这个艺术家特有的标誌，这种特有的标誌，我们把它叫做『风格』。」

这个卑之矣甚高論的定义，我固不敢說因为經我「欽定」，就委强人所同，可是至少它是我以后一直在談着的风格。此风格非彼「风格」。

關於风格，值得討論的細目很多，現在我們且暂时把焦点集中在一个方向，那便是「风格的自覺」。「风格的自覺」，我以为那是一个艺术家得救的起点。

說「风格的自覺」是艺术家得救的起点，玄異是說，若沒有「风格的自覺」，那么这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就完蛋了。換言之，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仅仅有风格还是不够，除了必須具有自己的风格外，他还得有一种「风格的自覺」。

可是，什么叫做「风格的自覺」呢？一个艺术家为什么必須有「风格的自覺」呢？它究竟为什么重要若此？这一连串的问题是需妥一作答的。在拙作「論艺术的风格」里面，笔者就曾提及「风格的自覺」，玄乃語焉不詳。按照我在那篇文章的解釋，所謂「风格的自覺」，是指「能够意識到自己的风格，能够指、分析、比較、批評、發展、最后超越自己既有的风格。」也就是說，所謂「风格的自

覺」，是指一种超出风格之外而反觀自省的能力。

首先我们得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非冒牌艺术家，第一个条件是必須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有了风格你就取得了艺术家的身份証。因为惟其如此，你的作品才不致於仅是另一堆作品的拓本，而是名实相符、独一无二的創作。「取法乎上」，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捨弃一位某道大师，而去将就該大师的一个亦步亦趋的撇扭的模仿者——一個打了折扣的「大师」，犹之人们不会真有兴趣去品尝一杯掺了过量兑水的佳酿，至少不会觉得它够劲。所以「李侯有佳句」本是一种恭維，但若接着說「往往似阴鏗」，那就不啻是一种挖苦了。可是，如果你是你，而不是梵果第二，更不是个三流莫泊桑，那末艺术的天地就少不了你；少了你，这个艺术天地就不是适才的艺术天地，就永远有着不可补偿的欠缺。你也許未便仅仅因为有风格而自許为大师，（那有滿街的大师？）可是最低限度你不愧是个堂堂的艺术家。你妄負於「艺术家」这个称号。有风格未必是作为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充份条件，但确妄疑是必要条件。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不故弄玄虛、自欺欺人的話。

然而知之匪艰、行之維难，道理固然是那么简单，可是我们有充份的理由相仪，这一点在艺术界並沒有受到充份的注意，否則的話，幹嗎充斥艺壇的，又多是亦步亦趋、競相因襲的貨色呢？我们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一律的千篇。「千篇一律」虽然是自小就耳熟能詳、听厌了的一个創作上的戒律，然而可叹的是当我们已經「滿师」而正在「闖蕩江湖」的时候，我们却仍不免犯禁。

或曰：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倒也說明了真理的另一半，也不失为对上述的現象的一个合理的解釋。艺术，的确不是一个容易侍候的千金小姐。一个有心另闢蹊徑的习艺者，敢說他有絕對把握能創出崭新的风格，令人为之侧目嗎？恐怕往往也只是心有餘力不足耳，这原是多么不可必的一件事，而这件不可必的事不啻是对习艺者的一个考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块可造之材；若不幸他真的是不可雕的朽木，我们除了惋惜之外，也爱莫能助，仍不能因此就說他配染指。我们並不動輒把「努力」二字期諸一个不相干的人。

以上所論，玄非是在說明，姿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风格，已經是够难能的一件事。难能則仗然，可貴則未必。你有你的风格，那么在艺术的世界里，你已經取得了你的席位。可是我们不能說，光是有风格一点，就够得上使你成为一个大家，否則的話就「走得太远」了。我们不仅不說仅此能成大家，我们还姿很严厉地說：如果仅有风格，而全玄风格的自觉，那么你将是一个沒有什么看头的艺术家；这就是你完蛋的開始，也就是你開始的完蛋。惟其爱之深，所以責之严。我们本末就不以为人人都是可能的大家。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結論，是怎么得来的？

原来风格的形成，究不出二途：有者「不訛不知，順帝之則」，他们从来就沒有想到风格，只是不断地創作、創作，假以时日，持之以恆，自然而然的，倒也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风格。有者「經之營之，梦寐求之」，他们一开始立意創造自己的风格，到后来果然如愿以償。一个艺术家之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是經由那一条途径，如果他永远耽溺下去，那就玄异自囿自己的領域，自限自己的进境了。因为長此下去，势必流於自我抄襲。我们不齿競相抄襲，我们自亦不鼓励自我抄襲。一个艺术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有些「大同」，实在也不能尽免，这未必就是一种絕對的遺憾，只要其间有够多的「小异」；可遺憾的是「大同」越來越多，「小异」越來越少。但「大同」越來越多，「小异」越來越少却往往又是艺术界的一种通病。这种通病，并不鮮見。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經驗：当我们第一次讀到某一个作家的时候，就觉得清新可喜；再讀他的新作，觉得也还可觀；以后就觉得他稀鬆平凡、全玄新意；以后竟覺得他濫調连篇；最后甚至覺得他厌倦煩膩、胃口倒尽了。我们对他的态度的转变是从喜爱到厌恶，有迹可寻，其發展恰是一条渐降曲綫(decreasing curve)。一開始会觉得他清新可喜，不能說他沒有风格；再下去总觉得他老是那么一套，足見他沒有风格的自觉。我们惋惜他不在自己的話快姿变成濫調之前，及早急流勇退，把它揚弃。

为什么他们会停滯在百尺竿头而不能更进一步呢？對於不同的人，應該有不同的解釋。對於一些「后起之秀」來說，他们刚刚鍊成

一套「武功」，躊躇滿志之餘，不免顧盼自雄，正在滿懷得意的當兒，很难馬上有一种警覺，时时提醒自己：在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的时候，也正是潛伏着一种危机的时候。刚学会开汽车就横衝直撞起来。居安思危不是他们的本性。對於一些「前輩」來說，他们接触到太多的后生小子，在一天到晚不断「諱諱善誘」的情形之下，更不容易有落伍的警覺，於是在遇到一千个庸才之后，就習慣地把第一千零一个那个小子也視如等閑之輩。於是就像白头宮女說天寶遺事那样，一仍旧貫地津津乐道那些敷浅的「入门話」，原来这些「入门話」就是他们自以为的「行話」，殊不知自己是一隻新井蛙，这隻新井蛙虽在旧井之上，玄奈却在新井之下。玄怪人家說：「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种晚不成器的「前輩」，焉能不被时代所唾弃呢？我们固然不是浅薄的「艺术进化論」的仗徒，可是我们却还敢十分肯定地说：若一味只知自我抄袭，不斷重複着自己說过千百遍的老話，那就註定落伍了。

那么，为什么一个既具风格的艺术家，在登堂入室以后，马上就潛伏着这么多危机呢？这关键可以溯源於一种「蔽」。这个「蔽」我把它叫做「經驗之蔽」。一般地說，經驗这东西总是可貴的，一个力求进步的人玄不努力於經驗的汲取。可是「福兮祸所依」，比較不受人注意的是經驗的不大可貴的一面。

原来每一个登堂入室的艺术家，一定訓練有素，除了掌握一切基本技巧以外，他一定总有一套独到的「看家本領」。这一切习得与独得的技巧的运用是那样的娴熟，以致几乎变成他们身体的一部份机能。他们习惯於这套技巧，所以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不假思索。旁人看来是难如登天，他们做来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们且慢羡慕他们，他们那一套「武功」，很快就变成一种該死的累贅，更糟的是这种累贅反而是后生小子可以倖免的。在某一个意义上，「新鲜人」确乎比他们强得多。須知道：要养成一套习惯固然不容易，可是要丢掉一套习惯尤其不容易；要記憶，固然不容易，要忘掉，尤其不容易。叫一个人把半生煞費苦心所习得的一套，悉数抛弃，然后在一玄凭藉的情形之下去「玄中生有」，其苦可知。至於那些「少不更事」的「后生小

子」，他们是「身空長物」，一空依傍。既空「看家本領」可資乞援，妾創作，就得摸索。摸索对他们是唯一的凭藉，是天經地义。他们不可能求助於那一路数的花拳，也不可能借重於那一路数的绣腿，唯一的「逻辑」，就是在混沌未闹的状态之中瞎摸乱撞。这样的瞎摸乱撞，失败的机率(probability)自然非常之大，可是失败的机率很大並不杜絕了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在前仆后繼的延续中，「万骨枯」之后，仍然少不了「一将功成」。不怕虎的往往是初生之犢。最使「老前辈」气短的是他们竟栽在区区几个「黃毛老子」的「怪招」之下，一身本領、半世声名，俱付东流！这个教訓还不够警惕嗎？

糟就糟在「老前辈」訓練有素（可惜太有素了），於是他们的創作活动渐渐的不免流於凝固化。状流水必潺潺，写暮雨必潇潇。於是乎整个創作过程不免淪为一种有板有眼的机械程序，距离心灵的探索越来越远。你妾詩歌嗎？那不費事，半斤名詞，四両形容詞，三両動詞，佐以若干叹詞忝为作料，加盐加醋，文火清蒸，於是乎詩歌出炉矣。試想，若論艺术价值，这种「很像样」的东西，有一毫之可称道嗎？

在技巧运用上，过去所学的一套早就根深蒂固，如形影之相隨，招之即来，挥之「不」去，大有碍於新技巧的操縱（特別是性质相反的新技巧）；在構思醞酿的过程中，更是如此。过去的經驗和过去的觀念常常予人以一种「反餽(feed-back)作用」，把他们的思路导致一个固定的方向：起先你是这样想，后来你想不妾这样想，可是想了一通，不知不覺又是这样想。如果你还是缺乏一种自觉，你就会想到一条死弄去而不自知，很难从另一个角度加以揣摩了。譬如一些画家的先入的觀念告訴他们：大紅大綠則浮浅庸俗。以后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設法规避大紅大綠。行之既久，固然也会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可是更可能的是限制了自己的风格的發展。殊不知「大紅大綠俗氣」云云，只有局部的眞理，或者根本就不是眞理，只是一种「老前辈」視為固常的(taken for granted)狗屁理論。退一步說，即令眞确，焉知高手不能履险如夷呢？如果一味墨守那条「铁律」而不知自省，以后还能奢望有新风格的出現嗎？

一种风格是可以、而且值得充份發揮的，發現了一种趣味，你不妨以很多作品充份地表現这种趣味。可是「充份發揮」和「一味耽溺」的分际却不可不察。如果只知一味耽溺於小有成的黔驥之技，以为天下之美尽在此，那就不啻作繭自縛了。一个艺术家最沒有出息的是拿自己的「武功」去跟那些「手足縛鷄之力」的張三李四比；一个学有专長的人也一定不屑拿他的「絕學」去跟那些略訖之玄的人比。更重妥的是「英雄不问当年勇」，有出息的人那里会有闲心去自珍那些「敝帚」呢？

所以說艺术玄王道(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Art)，却有許多閔，第一閔是創造风格，第二閔是超越风格。

我不以为誰能有一套法宝，可以教人如何如何去創造新风格，如何如何去超越旧风格，但至少我们可以为人指出一块絆脚石——一块人们往往視而不見的絆脚石。以此，为了使人自救，我们不惜給他一个当头棒喝，劝他千万要培养一种风格的自觉，进一步使风格的自觉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至少我们可以針對自己既有的风格多多指認、多多分析、多多比較、多多批評，並力求超越，至少我们可以从「前賢」的骸骨中，搜索出不少的警惕。

〔註〕●見拙作「論艺术的风格」「美术」創刊号（一九六二年出版）。

藝術的散文

——讀周粲的「鐵欄里的春天」

正当这文壇上略形寂寞的时节，詩人周粲以散文家的姿态出現，把他的散文集「鐵栏里的春天」貢獻給文艺的爱好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周粲不仅刻意於散文的艺术，同时也孜孜於艺术的散文。

是的，这的确是艺术的散文。这是我談后的一个总的評語——一个頗不低的評語。

我们所能談到的散文不可謂不多，甚至可以說，报刊上絕大多数的文字均屬散文。可是徒具散文的形式的，未必就是散文，甚至未必就是文；退一万步來說，縱使能称得上是文或是散文，也未必称得上是艺术的散文，尤其未必称得上是精彩的艺术散文。看！我们常看到的多數是些詰屈聱牙的散文、味同嚼蜡的散文、吟风弄月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平凡处是以过多的状詞來修談那毫不足奇的事物，浅薄处是以过多的感喟來宣洩那脆弱已极的感伤。这样的散文你如果談完一遍能不搖头几次不咒罵十几次，那已經是很难得了，若妄它啓發你的智慧，擴展你的眼界，給你以美感，給你以陶醉，給你以啓示，給你展示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精神伟力，那简直是难於登青天。那些誤入歧途（散文写作之途）的散文作者，根本就缺乏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所必不可缺的敏感与优越的表达能力，他们早就該把舞文弄墨的时间，花在別的事情上。他们作什么都沒關係，就是休想作散文家。

在这种不教人滿意的情况之下，周粲的「鐵栏里的春天」的问世，就更有着特殊的意義，更应予以重視。

說周粲的散文是艺术的散文，是有所本的，并非溢美之辞。我们不妨看看周粲到底是如何的講求散文的艺术，由是而証明他的散文确乎是艺术的散文。

散文的艺术，固多端也，其聳聳大者，曰立意，曰命題，曰遣

詞，曰造句，曰文調，曰风格，曰深度，曰强度，曰密度，曰弹性，曰質料……不一而足，不勝枚舉。在这許多方面，周黎都能有意地作出适当的處理。

立意是极其重姦的，它与命題分不開。一篇散文的成敗，往往就決定於立意上面。我时常覺得，对詩人余光中先生所發出正呼呼，文艺界实在應該予以普遍的重視，那就是「題目的現代化」。題目之欠現代化，往往是写好一篇文章的障碍，因为題目就是立意的指标。試想：写来写去不是「往事」便是「童年的回憶」，再不就是「褪色的梦」，这些題目，早就陈腐不堪，早就成了新文艺八股了，你还有胃口談下去嗎？我可沒有。「我们怎法想像，一篇洋溢着現代精神的作品，居然肯戴上一頂癡鈍的帽子。」有些題目雅得太俗，适足令人恶心，什么「妾似朝阳又照君」啦，这种电影譯名式的題目，我看还是少写为妙，这是一个作家得救的起点。試翻阅「鐵栏里的春天」的目錄，映入你的眼帘的却是一片清新。你看：质朴的有「錯过」，「玄視」，「枯瘦肌膚上的一条龙」，凝鍊的有「生命的裝束」，不加藻飾、直截了当的有「同情心」，「午誦」，富於美感的有「网霞」，富於哲理的有「快乐的数量」，發人深思的有「鐵栏里的春天」，出奇制胜的有「新」。这些多彩多姿的題目，在在足以吸住讀者的好奇心。

立意的确是非常重姦的，有些文評家甚至还这么說：艺术就是选材的能力。这能力在可学与不可学之间。說是可学是因为我们似乎尚可以有意地避免說腻了的話，写滥了的題材；說是不可学是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須具备那种特有的敏感。这种敏感能叫你从普遍的事物中發現特殊的意义，那是「納須弥於芥子」；能叫你从特殊的事物中發現普遍的道理，那是「一顆砂里見世界」。这种敏感有些人有，有些人不幸沒有。很幸运的，周黎尚有这种敏感。其敏感見之於他对題材的取捨，見之於他对事物的看法，見之於他表达出一个意思时所採取的方式。因此周黎能从一片叶子中，领悟出生命的偶然，胜利的僥倖与失敗的冤枉，从一个蜘蛛网惊叹自然的傑作，从鐵栏里不知名的小花，去寻找那闕不住的春光，由是而对它除了爱之外，还抱着敬

意。周粲的思路有时似乎很野，野得似乎飘忽不定，无所抵止，从「綠草如茵而拥着半个紅亭的花园」，飘到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由是而有「我们原如一滴水，偶然在古老的石钟乳上滑过」的妙悟，从而有「只要我们及时发现自己，认识自己，那么这番短暂的旅行，也就不显得白费了」的指示，这种神思的漫遊，远则远矣，可是贵在一点也不显得牵强，自然而然、渾然天成，隨笔体散文(*familiar essay*)的艺术即在此。對於一些在日常生活中足以教人惊叹不已，而又为一般人所最易忽略的小事小物，周粲常不吝啬出詩人的呼喚，叫我们从視而不見、聽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永恆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这不是敏感是什么？可是对那些不解风情、不识风雅的「梦的挑破者」，周粲却郑重地告诉他，如果有些美丽的梦并不是「迷」梦，他仍愿意逗留在梦中，讓梦的瑰丽滋養着生命，使生命显得更加绚烂，那怕他本来就知道：梦原不过是梦。这又是看似矛盾实則相反相成、互相补足的态度。这不是敏感是什么？

我一直就想隆重其事地发出这么一个呼吁：讓我们開拓散文的領域，讓我们摒弃新文艺八股式的散文，去創作新散文。

新散文，在我的心目中不是个空洞的名詞，而是有具体的內涵的，至少它迥异於我们所讀到的一些散文。新散文必定有新意，那怕是描写最寻常不过的事物，作者也必定能够提出不寻常的看法与見解。試想：若不是描写晨曦的瑰丽便是縷述夕照的绚烂；不是慨歎於世事的变幻便是有感於人生的玄常；写不完的也只是椰林风月，說不尽的亦不外甘榜风光；伤感起来可以为一个捱打的孩子掉眼泪，激动起来可以为一个倒霉的小販鳴不平。我们难道真个題材枯窘到这么严重，除了类似中学生习作的題材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仍可一写的題材了嗎？

周粲的散文，能够脱离新文艺八股，所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有点「三不像」，可謂粗里有細、細中帶粗；隨便得不致流於臃肿，又說不上是抒情还是写景、是敘事还是咏物，又不同於一些离閑文学的領域頗远的所謂雜文。他对於大自然永远保持着一种惊异与讚賞，却不仅仅是浅薄、談之令人懨懨欲睡的純粹的景物描写；他常常能够从

极端平常的事物中發現出深奧的哲理，這使他的文章有深度。有深度斯有餘味。但是他沒有忘記：文學並不是哲學，文學不應該迷失了它自己的方向，去作為義理的附庸，文學永遠有異於朱夫子在白鹿洞的講道。

由於長久沉浸在詩詞的研究中，周粲對辭藻的鍛鍊，習慣地是相當講究的。像「注定與偶然」一文，從那些凝鍊而濃縮、如詩的語言中，我們可以在看出作者那種遣詞造句的匠心。文學本來就不仅仅是語言，文學應該是經過加工的至精至純的語言，因此作者在修辭上的重視，我是贊同的。我不仅贊同，我还希望讀者展讀之際，切莫囫圇吞棗，急不欲待地草草讀完，而要細細玩味，才不致於辜負了作者的苦心，才不致於輕易地放過了許多應予欣賞的文字的美。

可是一般來說，周粲的文字是淺白的，最適合中學生作為文範，可是淺白而不致於太淡，淺白却不避文言，淺白却不避歐化，有時他還容忍口語的出現，有時他又容忍典故的存在，確是一種五味調和的語言。在句法上也變化多端，起伏有致。其循規蹈矩處使你誤會它平白，其順序顛倒處教人懷疑它不通，殊不知那兒是美的所在。為了使語言更形豐富，這種左右逢源，酌量地從文言，歐化語句，甚至從典故中汲取營養的文字，毋寧是值得鼓勵的。寫成的到底是「文自佳偶」還是「文白冤家」，這就是作者的才情與功力的試金石。

周粲的散文，無疑地具备了我心目中的「新散文」所應該具备的一些條件。如果還要請我提供一些意見，作為精益求精的參考，我願意說：應該更加着力的是「強度」。「強度」一詞，是我所杜撰的，這是我個人所提出的一個概念，此處不疑詳述，容後為文詳加論列。強度不同於深度。一般的說，一篇文章意味深長，有深刻的寓意，謂之有深度；深度是膚淺、平薄的反面。強度則不然。簡單的說，傳達一個意思而極具說服力，傳達一個意象而極能令讀者產生深刻的印象，謂之有強度。我覺得「鐵欄里的春天」的一些篇章，如果能更積極地增加其強度，那將會有比現在更好的效果了。強度之形成，決於最精當的字眼，決於適度的重複，決於語句上孰先孰後的取捨，決於層層深進的技巧的把握。周粲論詞，曾就層層深進的技巧詳加剖析，相仗有比我更加深刻的了解，我提出這個意見，亦不過是个提醒罷了。

期待新散文的出現

有些人說：在新文艺的諸部門里面，最有成績的當推散文。這種說法是否正確，繫於「有成績」一詞究竟委作如何的詮釋。如果所謂「有成績」是指量的多，那麼我們也許未便遽然加以否定；如果所謂「有成績」是指質的佳，那麼我們似乎不宜貿然加以肯定。因為這種說法，縱使不至是一亥是處，亦不免離譖太遠了。

誠然，自从白話文學被擁进了大雅之堂，迄今，在量的一方面，以散文的姿态出現的文字固不可謂不多；甚至可以說，絕大部份的文字都是散文。可是「徒具散文的形式的，未必就是散文，甚至未必就是『文』」。例如報刊雜誌上常出現的秘聞、逸事、史論、掌故、名人傳記、科學小品等等的「禮拜六派」的非詩非小說的文字，固具散文的形式不誤，但是諸如此類的東西，無論是从作者的目的或讀者的需求來說，都不在於「文」。作者委的只是娛樂（to entertain）讀者或供給一些零星的常識，讀者委的也只是讓人家娛樂（to be entertained）或多懂得一些常識，如此而已。「文」是它的餘事。偶然在这些东西里面若能發現一篇半篇文采斐然、清新可喜、朗朗可誦的文章，那是意外之外，那是可遇不可求，非常不可必的。那麼扣七扣八，剩下來可以歸入「純文艺」的範疇內的散文，根本就不会太多。可見即使從量方面來斷言散文的「有成績」，還是很难保險的。

但是，從質方面來斷言散文的「有成績」，那就更難保險了。說從五四以來，散文在質方面已經很够水準，那是一種令散文家臉紅的說法。一個讀者如果良心未泯的話，那麼他一定不會對人說或對自己說，自新文學革命發難以來，我們所能讀到的文學的散文，已經相當有成績，那怕所引証的散文家是一個素負盛譽的散文家，否則的話他就忽視了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我們委這樣說，絲毫不不是委一味大言不慚、目空一切地故意抹殺；我們委這樣說，是而且只是本着一種責

备賢者的春秋之意，未指出一个事实：在散文这个部门里面，我们的收穫的确不如理想，至少不如一些人心目中所誤認的那么理想。

誠然，如果我们站在消閒解闷的立場和本着宅心「忠厚」的「說客氣話」的态度，我们也未始不可以說，这几十年来在散文方面，我们已得到大丰收。但是，实事求是的严格的文艺批評的态度和「說客氣話」的态度，應該是截然不同的。未来的文学史家若非尽是昏庸矇昧，他们必定会給那些散文家作一番适当的重新估价。那时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客气話」与非痴則愚的烟雾将会渐渐地沉澱，而那些曾經馳騁文壇、接受过欢呼喝彩的散文家究竟有多少斤兩，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得出来了。然而，这話並不意味着：他们必定会被将来的文学史所遺忘。不会的。未来的文学史上也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过，「開創之功多」，他们之所以还会被記起来，泰半是因为他们曾經「不为师」地「但開风气」，而並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就之高。

不管你是个尚有慧心却又是「印象派」的讀者，还是一个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文艺批評家，面对着几十年来的散文，你总不免或多或少的感到失望。失望的原因是我们很难从那些既已馳譽的散文里获得应有的美感的滿足。美感也未必絕對沒有，只是少得不成比例。

試遵照新文学史的指示，去把五十年来一些比较重姦的作者展談一遍，如果我们的艺术良心尚未麻木不仁，那么我们恐怕很难问心无愧地說，这里面有很多能传諸久永的不朽之篇。更糟糕的是有很多散文，你姦是缺乏披沙检金的打祿、烏龟的耐性和駝鳥的懶怠，我很怀疑你尙能終卷而不拍案叫罵（不是拍案叫絕，mind you）。一些「久仰大名，如雷貫耳」的散文集子，很不幸的，「一旦得見」，却往往又「不过爾爾」，跟它们所暴得的大名是何等的不相称？

当然，說那些散文俱玄足觀亦不尽然，如珠如玉的篇章，亦偶有所闻；择地有金石之声的奇文，亦不玄所見，但在比例上是那么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数字，因此的确不如我们所預期的那么足觀。如果号称代表的作品已不能教人滿意，那么我们还敢奢望於等而下之的貨色嗎？

作为一个任性的讀者，我常常在非文学的类里面，欣賞到文字的美。而事实上不少科学哲学的著作，其条理的清晰，其文采的斐然，

仅以文論之，就是放在文学的类里面，亦玄愧色。說得危言聳听一点，散文家如果再不爭氣，那么将来委欣賞到散文的美，恐怕就只有在非文学的类里去寻找了。套用孔老夫子的說法：文不文，文哉？文哉？既称「文章」而又不成其为一篇文章，还称什么鬼文章？文学家的专业的尊严到那里去了？

委維護文学家的专业的尊严，不能訴之於权威，不能訴之於巨棍，不能訴之於「神話」，尤不能訴之於道兒岸然的視而不見。委維護文学家的专业的尊严，只有从质方面把作品提高，別无他途。

总而言之，几十年来的散文玄疑是有病的。如果說它沒有病态而又不是諱疾忌医的話，也許是因为一天到晚泡在久而不闻其臭的鮑魚之肆里面的原故吧。

承認了病态的存在，我们就不該再諱疾忌医了。我们甚至也不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該而且只該先給它作一番通体检查，找出根源的所在，然后再設法对症下药。

常見的散文往往不免有病，这是毫無疑问的了，然而我並不是亦不自以为是有資格为它診治的医生，我不能亦玄意委越廚代庖地从紛繁的病态中，把那些徵候一一指陈。但是，犹如一个老饕有权向廚子委求上好的菜色，我亦有權理直气壮地向散文家發出呼籲：老是吃那几道菜早就吃膩了。真正的名厨难道不能弄几味新鮮可口的菜色来嗎？「文不文！文哉？文哉？」我们委求「新散文」。写一些令讀者耳目为之一新的新散文，現在是时候了。

我虽玄意权充医师，但看到一个人瘦骨嶙峋、臉青唇白，我们至少可以断言他一定不大健康。因此我又何妨「印象派地」把常見的散文的不够勁的地方說說呢？質言之，我们常談到的是不大健康的散文，其显而易見的徵候在格調之低，在見解之卑，在技巧之拙，在功力之缺，在題材之狹。

格調之低真是一件艺术品的致命伤。我们很难想像一篇格調已低而仍不失为傑作的散文。有一句散文家老爱拿来自向文評家反唇相讥的話，那便是文評家都是「眼高手低」。那口气彷彿是說：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遺憾。其实，如果这也是一种遺憾，那么更遺憾的應該

是「眼低」。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問題：既已「眼低」是不是仍然能够「手高」？很显然的，「眼低」而「手高」如果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話，至少那是相当的意外。所以說：寧失之於「眼高手低」，毋失之於「眼低」。

形成格調的因素必定很多，其中主要的一項是品味。品味是一连串取捨的历程。一切艺术創作的过程都离不了取捨的抉择。一个句子是否應該割愛，一个意思是否尚欠發揮，一种情境是否应加渲染，在在需考究品味的能力。我们时常讀到一些恶俗不堪或雅得很俗的散文，就不免感到：如果作者能稍惜墨，那么他就可以減少讀者对他的厌恶。品味低使一个「行家」显得矮了几尺；品味高使一个「爱美家」(amateur)高視阔步毫无愧色。「行家」如果因为自己是「行家」而鄙夷「爱美家」，那就适足以証明他是个入錯了行的「行家」；「爱美家」如果因为身为「爱美家」而每怀羞澀，那就不免太長他人志气減自己威风了。

我们試一讀五四初期的几个散文家的作品，就每感到他们的煞費苦心，有时竟不免弄錯了方向，以致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拿一棵老树的復甦来讚美生的意志的坚强，也居然鋪陈成篇。其实这不是很起碼的象徵手法嗎？拿一个池塘的种种来侈陈它在月下的形象，这不是很平淡的景物描写嗎？一个經常批閱文艺习作的人，自然会了解，碰到这一类的文字会有多煩膩，否則难免不是他一己的嗜痴之癖了。我们如果不欲再自囿其視野的話，一定不好意思搜索枯腸，空話我話，违背自己的良知地去妄讚一番。我们会覺得委不是自甘於故步自封的話，我们的欣賞力与要求，早已从这种啓蒙的状态中提升到另一个更成熟、更高超的境界了。一如我们虽然曾在孩提时代一度耽玩泥巴，可是現在早已不感兴趣了。我们的不感兴趣不是因为我们麻木，更不完全是玄知玄能，而是不再轻易地被滿足了。一些閨秀派的散文每被貧咀的人形容为「晶瑩如露」、「玲瓏透剔」、「脫尽人间烟火味」，其实往往就病在視野窄隘。有时只是兒似的雅，只是雅极而俗的脆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希望他毋寧「俗」一点，或俗得雅一点。因为不能發現很多「不容易看出來、而事实上确是存在着的」文

学趣味，以致誤以為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止於此爾，因此她们不能超越那个小天地而另闢新天地。另闢新天地，唯有寄望於巨人般的散文大家。

如果说格調是屬於感性的話，那么見解是比较接近知性的。知性的，表現在散文上是常識、是主張、是智慧、是思想、是学问。感性的孰是孰非，也許可以說本乎一心，比較主觀。犹之你偏偏愛綠色，那么我的確很难說服你去愛藍色。知性的孰是孰非，我们却不好武斷地說：因為我說「然」，所以它不得不「然」。我们只可以「然其所当然」，却不可以「不当然而然，当然而不然」。知性的是比較有公是公非可遵循的。

每当我们讀到一些缺乏常識、錯誤百出、似是而非的散文，就很难不「迂怒」到它的另一方面（譬如它的优美的文辭），而仍保持着很好的胃口去品尝它。散文家如果明白「錯愛」与「錯怪」是这样容易發生的話，他就應該知所警惕，而不讓其他方面的优点，很冤枉地被他的浅俗粗鄙的見解所抵消了。很多流行作家我们不忍卒讀，若非太过谦虛的話，總覺得我们对人事对世界的看法，比他们的稍胜一筹；对一些問題的了解与洞見，比之尤見深刻；對於某些學問的認訛，亦較正确，就自然不会对他们作很高的估价。一个恥居文人之列的非文人，如果偶然讀到那些見解卑下不入流的文章，能不以偏盖全地一竹篙打落一船人嗎？很自然的，他们会說：看吧！其幼稚、其不成熟到这个地步，宜其雕虫小技壯夫不为也。

或曰：散文家便是散文家。散文家的造詣是不能靠思想的伟大性与正确性來評定的。这話「然而不然」。一篇散文的优秀固不必完全决定於內容的正确与思想的深刻。不能說因为它說得都对，所以它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的偏見是：如果它說得都不对或多半不对，那么它絕對不会是一篇好文章。「滿嘴荒唐言」的散文必定是讀者唾弃的对象。十句話里面有十句說对也許並不会給你帶來什么喝采；十句話里面有一句說錯却往往就会給你帶來許多倒采。所幸我们要求於散文家の很低。我们要求散文家「言玄不知」。委嗎，就別說；一定委說，就別胡說。在心灵上是个潘彼得（Peter Pan）毋寧是可喜的，童心未

泯使你保存着許多可愛而又可貴的純真；然而，知能上的永長不大的潘彼得永远是个可悲亦復可怜的人物，給人家的印象是「老不長進」。

技巧之拙也是一种散文的流行症。虽然「踵事增華」，發展到极端可能不免淪於捨本而逐末。光是斤斤於用字、遣詞、審音、析理的功夫而忽略了其他諸方面，可能会因为過於藻飾而显得臃腫不堪。这也是一些人老爱拿來喋喋的老生常談。說句公道話，这老生常談尚不失为理有固然。可是，（好一个「可是」！）难道在「不忽略其他諸方面」的同时，仍精研技巧，是不对的嗎？捨規矩欲為方圓，殆矣！我们每每称讚一篇文章自然而沒有斧鑿痕，有如流水行云，天馬行空，涉筆成趣，焉知这不是技巧的运用既精且熟，已入化境的結果呢？我们每病某文仅事雕飾，华而不实，焉知这不是技巧的运用尚未到家的結果呢？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的类型看，是應該有着它別於其他类型的地方的。就在这些地方苦心精研，我们就可以把它發展成一门「散文之为散文」的艺术，为散文所独专。散文既为「散」文，又沒有固定的形式，又不拘固定的結構，真是自由得很，於是人们所說的話就不失为散文。人人都說了一輩子的話，豈不是人人都成了「散文家」？然而看了許多隨筆，我们总覺得它就嫌太「隨」笔了一点。散文既然拥有着最大的自由，我们能讓这「可貴的自由」变成「可咀咒的自由」嗎？「把戏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各有巧妙」的餘地就很大。然而「怎么样的写法会产生怎么样的效果」的「奇技淫巧」，竟这样少人探討並加以实践，这能說不是一件可叹的事嗎？散文沒有故事情节，散文如果要吸引讀者，和詩歌小說爭一日之長短，一定要靠它所特有的魅力。要發揮这特有的魅力就得借重种种技巧。看到一些散文，总覺得它的「起承转合」沒有什么特別高明或是不得不然的地方；覺得它的文字與其說是流暢，毋寧說是如同白开水似的「孩子話」；略見高明的，竟又不外是些如同塗脂抹粉的僵屍似的新濫調——「文艺腔」。「文艺腔」的悲剧是：出自追求艺术的本意而竟做出反艺术的結果。

我们不是不可以鄙夷技巧，但是在鄙夷技巧之前我們必須已經是

一个技巧大师。散文家最鲜明的专业的标誌之一，而令外行人有「隔行如隔山」之叹，而对散文家仰之弥高的，應該在於：散文家嫋熟了一切的技巧。

功力之缺是那些教人失望的散文的通病。很少人写「小文章」像李長吉那样騎驢猎詩、焚膏捕句、呕心瀝血花上十足的精神和气力，更少人把写「小文章」視如建一座帝國大廈那样的大工程。「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一般人所不能想像，和一些写文章的人所不能耐煩的。「『推』『敲』之决，賈島茫然」，濫产作者每病其過於謹慎。「撚断几茎鬚，而成四韻詩」，豈非笑話？

或曰：文章一何小，工程一何大！然而，如果你愿意把生命獻給散文的繆思，那么「雕虫小技」就是雕龙大业，散文家还有什么理由不應該支付出建設大工程所需的功力、耐心与謹慎去創作他的「小文章」呢？每每談到一些文章，稀稀鬆鬆、平平淡淡、全无奇句、了无餘味，「一CC的意思写成十加侖的文章」，就覺得他们除了缺乏才气之外，尚缺功力。如果此輩作家尚能傾力以赴、經之營之、刻意求工，那么縱使或囿於天才的短缺而不敢保証一定精彩，却也总不致於「坏得到了家」。不幸有者竟率爾下笔，不能自休，那得不勞而少功？

下笔不能自休，誉之者美其为流暢，於是「波瀾壯闊」、「滔滔不絕」、「一瀉千里」諸如此类的浮詞泛語就好像不需委本錢那样地扔到这类作品的身上。殊不知一瀉千里，往往只是「浹沙泥以俱下」，若能瑕瑜互見，已是不可多得了。

功力的內容如果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發現它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見於創作时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的功力則是經年累月所孕育得来的結果。前者是指創作时战战兢兢、悉力以赴、苦心揣摩、以牛刀杀雞；后者則是指平日所修养、所汲取得来的智慧、学养、經驗之多寡、对文学造詣之高低与夫对写作技术之嫋熟的程度。前者是重委的，但后者若不必更重委的話，至少也不会较为次委。「孩子的心」如果是可貴的話，那么「孩子話」只会是一种不成熟的徵候。委去掉这种不成熟，則有待功力之涵养。「滿腹詩書氣自華」，

這方面的功力的表現，不純然是小心和努力的結果。我們希望有志於散文寫作的諸君子，在奢望「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之前，多多汲取讀書行路的經驗，先養足一肚子的浩然之氣，那時「興酣筆落搖五嶽」，毫不嫌遲。

說到題材之狹，也無疑是那些不入流的散文的致命傷。對症下藥的起死神丹，就是自覺地去發掘新題材，再不濟也得從全新的角度去處理舊題材。過於熟悉的題材，往往是令人望而生厭的主因。沒有人會有胃口啃下千篇一律的傷春。「若不是描寫晨曦的瑰麗便是縷述夕照的絢爛；不是慨歎世事的變幻便是有感於人生的玄常；寫不完的也只是椰林風月；說不尽的亦不外甘榜風光；傷感起來可以為一個捱打的孩子掉眼淚；激動起來可以為一個倒霉的小販鳴不平。我們難道真個題材枯窘到這麼嚴重，除了類似中學生習作的題材外，就再也找不到仍可一寫的題材了嗎？」

題材枯窘，給讀者的印象是貧乏與脆弱。如果這個印象是不幸的，那麼該負責的是那些拙於發掘新題材的作者。按理說，從宇宙之大至蒼蠅之微，無不可以成為散文的好材料，問題在你怎么去寫它。小品文，我總覺得它是一種未經充份嘗試過的文學樣式。在七十年代的今日世界上，無論是自然還是人事上的現象，均莫不予以紛然雜陳瞬息萬變之感。波譎雲詭之態，每有所聞；光怪陸離之象，亦有所見。充耳盡是「令人耳聾」的「五音」；觸目皆為「令人目盲」的「五色」。新的觀念，层出不穷；新的事物，屢見不鮮。面對著這個林林總總、目不暇給的大千世界，銳敏的心靈一定不無所感，新題材的發掘，即使不容易亦不是不可能的，何必一定委吟風弄月或自囿於愛情、友情、亲情的小天地呢？

自然景物也確乎有它永恆的美存在，這永恆的美亦將不會因時間的衝擊而受到貶損。表現這種美，散文家義不容辭，自不當輕易放過。但作家的筆應異於畫家的筆。作家所憑藉的是文字而不是顏料。作家的筆應該用來發揮文字之所長而不應該用來暴露文字之所短。如果拿畫來表現自然景物，那麼你是用可看的(visible)來表現可看的；如果拿文字來表現自然景物，那麼你是用非可看的(invisible)來表

現可看的。用非可看的表現可看的，永远是一种「翻譯」，在「传真」方面永远隔了一层。能够說話的时候我们何苦用比手势来代替呢？然而拙於「传真」並不意味着拙於「传神」。作家如果有足够的智慧不去暴露文字之所穷而力求發揮文字之所長，那么这个作家至少不是一个陷溺在死坑里的作家。因此，一个作家如果不耽溺於純自然景物的传达，而尙思触及自然景物投射到我们心里的「心路历程」，从而成就一种景物与心灵的交融，那么他至少是个不甘於作繭自縛的作家。

我们不該仅仅依賴一双肉眼，我们尤其不該仅仅依賴一双近視的肉眼，我们还得借重於心灵的望远鏡和显微鏡，唯其如此，我们的視野才会比較廣闊，我们的目光才会比較銳利，我们的洞察力才会比較深刻。

不堪的散文不但經常患着一种或數种流行症，而且一定还患着不少妄以名之的奇难杂症。以此，我们寄望於一种「新散文」。新散文应是一种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散文，而不是更不堪的散文。新散文会有一副什么模样的長相呢？只有預言家方能断言，只有天才方能有那样的想像。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新散文必然是接受过免疫注射的散文，在內容上它必定更形多彩多姿，在文字上它必定更形丰富有緻而且凝鍊，在美感上它必定能予人以更多的滿足。我们必须成熟，我们委告別那些既妄奇句又妄新意的白开水似的散文，一如我们必须告別那段少不更事的、稚气的童年。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新散文的出現，我们更殷切地期待着巨人般的散文大家的出現。

〔註〕●引自拙作「艺术的散文」。

隔靴搔癢

——「彩色繽紛中的一些感受」讀後

有一种搔痒，被搔者不胜其扰，搔者吃力不討好，那便是隔靴的搔痒。不通的批評給人的苦惱，往往是同出一轍的。本末，評論既已不通，一笑置之可也，实在不值得重視，犯不着浪費墨水去諄諄曉以大義。奈何我們深覺其中誤解頗多，而且頗巨，加以言之鑿鑿，像煞有介事，彷彿我們這些畫家的艺术水平就真个如同「彩」文所描述的那样（那样低或那样高），這豈能苟同？是非所繫，不敢輕忽；为了避免以訛傳訛，滋生誤導起見，我們不敢緘默。買櫟還珠，損失的原只是買者；可是若把骨头（如果有的話）吞下去，却把肉吐出來，還高嚦不堪入口不堪入口，我們豈能不正視聽？

這次「五屆現代画展」，我們繪畫界的一些同道，把近作公諸社會人士面前，承蒙不棄，居然不致於門可羅雀，這表示我們的努力，日漸受到注視了（且先別說重視），這在聽慣噓聲與鄙夷的我們來說，該是多值得欣慰呵！現在又居然有人不厭煩地發表觀感，形諸文字，其意可嘉，其情可感。可是如果所論距離事實一万八千里，那么可感的情形，就不大相同了。

「彩色繽紛中的一些感受」一文，對這次「五屆現代画展」的每一位畫家，或多或少，或褒或貶，都有一番批評。很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個展出者，現在竟為文申辯，彷彿錙銖必較，有失風度，說不定還以「小器派」見譏於人呢？可是當一個人深受誤解、含冤莫白的時候，我們豈能苟同於乡愿之見：把一切的冤枉放在「有雅量」的名義之下，哽咽下去，而不管会不会反胃呢？事閔闡謠，不敢怠慢。不過作品的好壞，向來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我對我個人的畫藝，寸心了然，向來不自以為十全十美，褒之不喜，貶之何忧？何況日後自有公論——是具有真知灼見的批評家之間的公論，不是阿貓阿狗間的公論——復何用乎喋喋？同時，我既沒法向「欣」文作者「證明」我的畫

确乎是杰作，辯之何益？予欲玄言矣。使我感到兴趣的（或使我不容忍的），倒是「彩」文中某些值得商榷的論点。

首先，讓我們談談風格。欣聞「彩」文作者十分重視風格，這跟我們同調，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其亦深得我心歟？不然！不然！且勿高興。可憾的是他竟以老吏斷獄的姿态，三两下板斧，就劈得我們落花流水，片甲不存。說什麼「何和应的画风似乎不够稳定」，說什麼黃奕全「还不能建立独有的风格」，還說我「最大的缺点也是还未能建立自己的风格」。这是十分严重的指責，對於这些极其武断、毫不負責的仗口胡言，我表示十二万分的反感，謹在此委郑重的提出我的抗議。試問：說我「还未能建立独有的风格」，有什么根据？能够举出任何一个画家，画风跟我的相同多过相异的嗎？妾拿两个人的画逐点作具体的比较，不妾說「某某人画圈圈，你也画」，於是就說我的画沒有自己的风格，正如我们不該說有奶便是娘。怕只怕評論的人根本就視若玄賸，買椟还珠，沒有眼力去認出人家的风格罢了。對於某些人來說，烏鵲跟凤凰是沒有分別的：它们都会飞。關於风格，我不知道「彩」文作者指的是什么？我个人平淡玄奇的看法只是「使他的艺术显得与众不同的諸特色的总和」。如果所謂「风格」是这个意义的风格，那么我妾郑重地质问一句：凭什么說我沒有个人的风格？凭什么說黃奕全沒有个人的风格？能舉出一些具体的例証嗎？怕只怕被評為沒有风格的画家，不但已具有风格，而且还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怕只怕觀者不察，竟把珍珠看作魚目罢了。

說到「风格不够稳定」，言下且不胜遺憾，彷彿风格是應該稳定的，实則大謬不然，一玄是处。殊不知惟其「风格不稳定」，才表示这个画家有着用之不竭的創作力。妾知道，許多画家的毛病不在於他们沒有风格，而在於沒有前所未見的崭新风格。这样說来，风格上的不稳定毋寧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有什么值得遺憾呢？这原是老話，此处不拟重複，如果有兴趣的話可以參看拙作「論艺术的风格」和「风格的自覺」。

最不可恕的是硬妾送我们几个祖宗，不管我们妾不妾接受。虽然惠而不費，可是此情此意，碍难接受，不得不完璧归赵。說黃奕全的

画有哥庚等人的影子在，說我「受德勞內 (C. R. Delaunay) 的影响」而且「頗深」（多豈有此理的一个「頗深」），实則全是天方夜譚，不知所云。且別說哥庚所作均属具象了，就說用色，哥庚每每喜用大片的粉紅、浅紫、土黃，这跟黃奕全有那一点相像？至於說我「受德勞內的影响」而且还「頗深」，更是令我震惊，因为，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就沒听过一个名叫德勞內的画家，也沒有見過他的画。現在據說我的画是「跟隨了他的構圖法」而作成的，真使我为之大悟，茅塞頓開，焉能不感激涕零？原末他的理由是：德勞內也画圈圈，而我也画圈圈，「所以」我受他影响頗深。狗有四个脚，桌子也有，所以桌子是狗。真是豈有此理。試問：除了画圈圈一点以外，我的画跟他的还有什么共同点？如果画圈圈就是我「跟隨」人家的罪証，那么那一个大师不是「跟隨」人家的？

妾知道：想在一件作品里面容納一切不同韵味的美，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有些美，是相反而不相成的。如果一件作品已經充份的表現出那个类型的作品所可能容納的种种的美感，我們應該說它已經相当成功了。我们不嫌一首小夜曲不够雄壯，也不嫌一首婉約的詞不够豪放。可是現在他居然嫌我的画「显得非常玄力」，怪魚兒不会唱歌、鳥兒不会游水。試问我几曾力求表現「有力」？如果我在这次展出的几幅画中都設法使它显得有力，难道不嫌不倫不类画蛇添足嗎？

「彩」文作者喜欢检一些我们所不齿的标准来批評我们，殊不知我们对那些早就該丢掉的狗屁標準並不抱什么敬意。譬如說黃奕全太热闹，黃奕谦太繽紛，在下也被評為「太繽紛而流於裝飾」（好一个「流於」！）我很了解張三的大肉往往就是李四的砒霜；对某些人来说，繽紛往往就是一种禁忌，裝飾更是膚淺的表徵，可是我的見解微有不同，我不以为我们必须把色素压低，而后格才高。我不但不以繽紛为病，而且还妾在創作实践上有意識地表現出来，以示我对那种可笑的理論的强烈抗辯，評論者了解我的用心嗎？小心！不妾把人云亦云、积非成「是」的流俗之見当做金科玉律。豈能用平庸的尺去量天才的光年？（我得赶紧声明：我絲毫沒有自詡为天才的意思。）

使人憤憤的是批評的人不假思索就輪起板斧，劈将过来，毫不留

餘地，好像一个瘋瘋癲癲的劊子手，杀錯人还在做梦。說黃奕謙沈板亮頗令人失望，說陳升榮的画缺少变化，說我的表現「不能令人滿意」，好大的口气，說得那么肯定。試問，凭良心說，就当代大师的水平來說不能令人滿意呢？还是就国际水平來說不能令人滿意呢？这里面恐怕除了良心的問題外，还有能力的问题存在呢。更令人气短的是硬要在諸位画家之间强为軒轾，真是拟於不倫。說「黃明宗的画在意境上比其他几位参加展出者都『超脫』許多。」这么說，在所有的画家里面除了一个以外，其他都不足觀了，是不是？我个人十分欣賞黃明宗的画，也承認他的画艺有一定的成就，不容抹杀，可是我委向「彩」文作者指出一个很重妥的事实：在艺术的天地里，有可以相比的部份，也有不可以相比的部份，风格便屬於后者。由於风格，故使各人的艺术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独特性。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宜强分高下。金魚比黃鶯超脫了多少？

「彩」文作者每喜侈言节奏，說黃奕謙「笔力不够强，不能产生适当的节奏」，說区区因为线条显得笨力，所以不能产生应有的节奏。我不知道他对美术的节奏有多少認识，也不知道他所指的节奏，是不是与美学家克罗齐所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节奏。何不先細讀拙作「美术的节奏」然后回头再看看我的画呢？如果还看不出来，我愿意代为分析，不收学费。

不知所云的話俯拾即是，譬如說什么「从視覺帶进灵界」、「二次元空间」、「心理空间」、「形而上空间」，我倒要請教請教所謂「进入灵界」是怎么进法？要唸佛不妥？所謂「形而上空间」是酸的还是甜的？真是匪夷所思！真沒想到在人类已經成功地登月而又安然地回來的七十年代，在神学与玄学以外的绘画天地里，我们还得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符号兜費神。說某某人的用色受西方影响頗深，也是妙不可言的一例。原未色彩还有东西之別，真是震聋发聩。未知三原色三间色之中，孰为东方，孰为西方。說我「以前展出的画鬆散、凌乱和轻浮」，这回又不知道他抓住我什么罪証了。虽然蒙他謬獎我「也有进步」，可是正如他力数我的「最大缺点」（他自以为的「最大缺点」）是玄的放矢那样，說我「也有进步」大概也是不知所云

了。我才不領这份情，「也有进步」这句话我委完璧奉还。

其实錯誤尚多，我也沒有胃口一一尽举，以免我的文章写得瑣瑣碎碎。其实，逼得我不得不执笔为文，这在不想轻易写文章的我來說，已經是件苦不堪言、难以忍受的事了。

老实說，在严肃的文艺批評风气还未建立起來的今日，對於严肃而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批評，我们欢迎之不暇；我们也充份的了解到，惟有严肃的文艺批評建立起來，褒其所当褒，贬其不得不贬，把烏鵲归之於烏鵲，凤凰仍归諸凤凰，然后才会涇渭分明、瑕瑜得見，然后艺术的价值才能弄出个一清二楚，於是乎真正的妖精必将会原形毕露，真正的紅顏也将不致於薄命。我们之不惜喋喋、权充苔辯，目的不在面子保衛战，我们的是非之心告訴我们：怕伤和气，大可以远离是非，做个乡愿。一个不常碰画笔的人，可否从事繪画批評呢？鄙意是：可以。但是起碼起碼，他必須具备过人的眼力。否則，若低的不仅仅在手，高的又偏偏不在眼，那便是身不盈百磅而力图举千斤，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出师未捷身先死，不通的批評本身就是个响亮的笑話。

虽然「彩」文並未署名或笔名（这又是一件怪事），可是我还是委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正正式式地向他領教几招。老实說，我对「彩」文作者作为一个批評者的資格根本表示怀疑，犹之我怀疑一个不懂德文的人配談德国文学。如果不服气可以先回答我一个 ABC 的問題：我今年所展出的画幅，在用色上有三个（实則不止三个）与前次展出所截然不同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不委用繽紛、灿烂、沉重这些可寬可窄可是可非的含素話，委說有确鑿是非可言、量得出、称得出的話。說不出來我当然可以奉告。如果視若玄賜，何由褒貶？是不是还配侈言批評，那就值得三思了。

夢魘與胡說之間

——「不是公論」讀後

因为「不」文作者早些时候在他那篇「彩色繽紛中的一些感受」的妙文中隨意裁誣，轻率論斷，毫無道理地把几位画家的成績一笔抹杀，触犯了众怒，在众人皆欲杀的情形下招来了反質；人家不得不指出他的謬誤以正視听。於是乎醜态百出，原形毕露，惹得个自討沒趣，啃下个不堪入口的苦果，这自然不会好受，但也只是咎由自取罢了，与人何干？照說，受了这次的教訓，就該慎言慎行、知所收斂了。这样，虽然不能抹去那个污点，也至少可以防止进一步謬誤於未然。如果他稍知自省，懸崖勒馬，痛改前非，那也就回头是岸，善莫大焉。不幸他却計不及此，意犹未休，还恼羞成怒，硬要將錯就錯，甚至一錯再錯，以致泥足深陷，替士林製造新鮮的笑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

不过，这回他学乖了，他略知避重就轻了；刀鋒不敢再向別人，而专委向我開刀了。可是，一些已經鑄成的錯誤难道是事后的千言万語所能交过飾非得了的嗎？实在也大可不必費心了。这篇「不是公論」之作，如果确是針對拙作「隔靴的搔痒」的辯白（虽然不大可能有什么可資辯白的餘地），我们也不妨看看他怎么說，玄奈他毕竟招架不來，所以对我那篇文章所提出的許多最为相干的反詰，除了開个玩笑外，却答不出来。招架不來居然还喋喋不休，又說了一大堆話。会是什么話呢？殆亦不難想見，吾不欲名之矣。

首先，讓我澄清一些可能的誤解，我不希望这一再的申辯被喚做「笔战」，因为一來这不是我的本意，再者，笔战云云，必有所爭，同时必須有个可敬的对手存在，才能發生。今則不然。我現在所进行的，主委是对一些誣告的抗辯。正如我们若被誣偷窃而查証实据时，不得不抗辯自衛，力求昭雪那样。这是我写「隔靴的搔痒」的目的，也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我才不致於玄聊到隨便找个阿猫阿狗來笔战。

綜觀「不是公論」這篇妙文，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所新發展的「風格」：它已經從循規蹈矩的平鋪直敍進步到閃縮其辭、游移其語了；它的玄的放矢叫人懷疑作者在向空氣說話。這次他不敢正式式的向我說話了，也不敢明明白白地指斥我了，而委製造一個假人——一個冒牌的畫家——旁敲側擊，指桑罵槐，極盡挖苦之能事，俾遂其譏諷之欲。可是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光明正大地說稱得出、量得出的話呢？這是他遠較我虛怯的地方，也是他不及我光明正大的地方，因為，當我向他質問的時候，我是堂堂正正地向他質問；當我說他荒謬的時候，我是明明白白的說他荒謬；我一點也不屑閃閃縮縮、鬼鬼祟祟，而為可能的反击預留金蟬脫壳之計。玄奈他却不此之圖，竟出此下策，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胆怯的痕迹。可是玄論他明說也好，暗示也好，影射也好，如果有骨头的話，就別遁辭，說：「我指的不是你。」何況，由他的影射在讀者的腦海中所造成的閑於我的壞印象，豈是他任何遁辭狡辯所能推卸得了的？所以不管他是明指還是影射，所指的還只是我——惟一的我。

閑於「玄力」之不必為病，我已經辯之再三，証明了他的指摘的不當，玄意再炒冷飯，豈料「不」文作者却意興猶濃，不肯罷休，不惜言之再四（恰恰是講了四次），並趁我自承「此次展出的畫玄意力感」之便，就自以為抓住了我的痛腳，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真是莫名其妙！他真以為人家沒這個本事，就未免太小看人了。也不摸清人家的底，就胡里胡塗地小看人家，除了玄知之外，還是可憐。殊不知人家的境界尚不致於其低若此。人家的第一個考慮，當然不是那個不成問題的技巧，而是整幅畫的總的艺术效果。必有助於這個總的艺术效果，而不致於破壞它，才採用某種技巧。人家比他所幻想的低能，高了許多。

接着他又在「祖宗」上面大做手脚。他說：「說新加坡是現代畫的『處女地』尚情有可原，硬說是『發源地』，那麼，沒有祖宗就真丟臉了。」除了文理欠通之外，這話還是一個歪曲。因為那絕不是我的意思。請問：我几曾「硬」說過新加坡是現代畫的發源地？也几曾有過這樣的暗示？硬要我不會說過的廢話就是我說的，這種栽贓的

手法，是何居心？我用「祖宗」这个隐喻，指的只是影响我们画风的那个前辈，读者看了也必会作如此理解。各文俱在，墨迹犹新，斑斑可考，谁曾裁诬，谁被歪曲，有如立桿見影，豈是他这种障眼法的笨拙魔术所能混淆得了的？也未免太低估读者的智力了。我不想歪曲别人，也不希望被人歪曲。

他說妾回答我那个ABC的試題，可是就凭他那两下子那里答得出！又不想交白卷，於是他就只好嘻皮笑臉，胡言乱語地闹个不相干的玩笑，說我（当然是影射，他才不敢明指）技仅止乎画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切线与圈圈，把我形容得如何低能，如何举起「癟抖」的笔，如何「笨力」，如何「没办法塗得均匀」，如何「搞不出别的花样」，如何「画圈圈不像圈圈，画直线不像直线」，於是劝我「及早收挡」，因为沒有「什么『良机』可乘」。这是他節外生枝的開始。他曾自承「沒有逻辑脾气」，恐怕他是說对了，否則幹嗎硬妾把一些毫不相干的題外話扯进去呢？我除了对他的指桑罵槐的伎俩表示不齿、对他的人物塑造的生动表示激賞之外，还对他这种梦囈表示惋惜。起先他只是「不满意」我上次展出的「沒有风格」「跟隨人家」的「最大缺点」罢了，現在他却妾进一步全盤否定我的艺术了。我的天！劈之不足，还妾把我碎屍万段；碎屍万段之不足，还妾把我剁成肉醬、这种失去理性，极尽詆毀之能事的話，說了（在报上）能够心安嗎？对着一个精通十种語文的語言学家高嚷：「你是文盲！你是文盲！」这不是作贱自己是什么？值得惋惜的是这种自我作贱将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我不便（也无意）自翻我的艺术造詣，但却深仗我的作品不是一番毫不負責、迹近瘋狂的仗口胡言所能否定、所能抹杀得了的。我的作品縱使沒什么稀奇，可是說這話的人如果是个視若玄晦（因为答不出ABC試題）的人，這話还会有什么份量呢？

又一个节外生枝就是他对我的基本訓練表示怀疑。（「一个连基本訓練都成问题的人，死妾画，（死妾作画家）」）。他真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深覺他不該隨便說这种不知所云的話。如果所謂画家指的是一代大师，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敢自命画家；如果所謂画家指的是：在繪画上有一定成就、一定訓練、一定造詣、一定天份、而潛心

作画的人，那么自称画家难道就表示大言不惭嗎？难道我一定妄自貶到一毫是处、把自己說成与画玄縁嗎？他当然可以怀疑我的基本訓練，我也不必向他历数当年勇，我的基礎究竟深厚到什么程度，自应由够資格的卓越画家評定，豈是阿猫阿狗可以越廚代庖的？不过如果幻想人家很不行的地方，恰恰就是人家很行而又並不沾沾自喜敝帚自珍的地方，馬上叫他自取其辱，豈不是可笑亦復可悯嗎？想抓痛脚却不知抓到一双虱毛腿，何其不智！所以我才不敢隨便小看人，因为旁边那个白面書生可能竟是个不露相的真人。

不幸恰恰相反，他一開始就說我自比凤凰（又是节外之枝），这是他的錯覺（如果不是歪曲的話）。試問：我几曾說过这话或有过这样的暗示？我比他所幻想的，妄謙虛了許多，白紙上的黑字可以替我作証。

最严重的节外生枝就是他說我「既乏基本訓練，又死委画」，因此，「最大的武器（只）是阿芝姐的來文，而不是他的『画』」（什么叫「阿芝姐的來文」？简直莫名其妙！此外，到現在我尚未写过一篇（仅仅一篇）來文），所以最好「及早收拾」，絕不会有「良机可乘」，为的是「历史上的大画家沒有一个是靠相罵走进歷史的」（他的高論却必定会走进「笑林外史」玄疑）。对这些极具侮辱性的話我委郑重地提出抗議。他处心积慮地暗示我是个滥竽充數的画家。这种詆毀，是双重的：在能力上，我低能，根本不是画家的材料；在人格上，我动机不純正，孜孜於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甚至不惜用画以外的手段——「相罵」、「阿芝姐的來文」——未招搖撞騙，图搏「虛名」。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这种誣告的严重性。閑於能力，他的詆毀之不当，我已經辨析过了；閑於动机，我委郑重地质问一句：說我（影射我）企图以相罵图搏「虛名」，有什么証据？我希望他不委因为恼羞成怒就肆意誹謗，以致損及他人的名誉。讓我们把凱撒的归之於凱撒，基督的归之於基督。至於我，我从未就不曾对他节外生枝，在他針對我所作的錯誤的評論以外的事大做文章。虽然很令他伤心地（实則何須伤心？）我曾怀疑他作为批評者的資格，但也只是因为他答不出我那 ABC 試題罢了。

在他的錯覺中，他也許會誤以為我刻薄，其實正相反，因為在這串事件中，我所表現的恰恰是厚道而絕不是刻薄。如果他知道我對他的許多錯誤只檢一部份出來，並且輕描淡寫地一笔帶過，難道他還不該向我致謝嗎？



藝術的簡與繁

有些人以为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与其简繁玄闇，五絶如登幽州台，仅仅二十个字，已經把那种「悵望千秋，蕭条异代」的寂寞的悲涼感宣洩玄遣了，而那些最見眞性情的文人画，往往只是晚霞一抹、流鶯数点，却极能以简駁繁，所表現出来的意境的高远，又豈是那区区尺幅所能局限的呢？而成本大套、连篇累牘，未必就有一毫之可称道；内容繁杂的巨幅，很有可能竟是一团糟粕。

这种說法，我起先頗為贊同，而即使到現在，我还是承認它有着若干的真理；但是經過反覆的思索后，我的脑海中渐渐的形成一个不大成熟的看法，与上述的說法頗相逕庭。那就是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和它的简繁，并非沒有絲毫的關係。

我說我的看法是个不大成熟的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玄緣遍覽羣籍，以互相比較，互相發明；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我虽曾几經思索，却玄暇作深邃而綿密的思索。有些問題，我可能視而不見；有些關鍵，我可能置若罔聞。因此这里所作的陈示，只能稱是一种极粗浅的初步陈示，至於严密的理論的建立，那就只好期諸末日了。

既然我說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和它的简繁不玄若干關係，那末又有什么關係呢？我如果能够把这許多的關係一一指陈，那末我就不啻在美学上，建立了一门崭新的理論，替美学開拓了一个新的領域了，可是我目前的学力与才智尚不足以語此。然而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一件艺术品，内容与形式若过於简单，它的艺术价值必不会很高；換言之，它很难成为一件伟大的傑作。我必須馬上声明：我玄意說简单价值就必然低，複杂价值就必然高，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这是幼稚(*naive*)到令人噴飯，不值一辯的。但是我虽然不以为一个人东西吃得多就健康，东西吃得少就孱弱，可是我却可以肯定：若什么东西也不吃，那末他不但是会日渐孱弱，而且一命嗚呼，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对艺术价值与简繁之间的關係的看法，也正

相类似。

简与繁，主要是指它的质，而不是指它的量（除非指的是文字，篇幅的长短可以决定其简繁；篇幅短，繁不了），而所谓的质，包括了内容和形式。譬如金字塔，它的体积（属于量这方面）不可谓不吓人，然就质（其形状）言，实在是最简单不过；譬如核桃刻成的小舟，论大小曾不盈寸，可是麻雀虽小，五臟俱全，计有人，有腹，有箬篷，有櫓，有炉，有壺，有手卷，有念珠，而人物情态，且极丰富，从质方面来看，其复杂远超过金字塔多多矣。

为什么两件艺术品如果均玄懈可击，那末繁胜于简呢？为什么一件过于简单的艺术品，比较地不容易成为一件伟大的杰作呢？我以为在纯粹的理论的思考上，我们固有详加探讨的必要；在实际的例子引证上，我们尤宜多所援引，好使我们的论旨更形明朗。

首先我主张指出：过于简单的作品，意味也許深长，内容绝不丰富，形式尤不会变幻莫测，更遑论多彩多姿？因此波涛壮阔的讚语，鬼斧神工的溢辞，质简的作品是无缘承受的。所以包罗万象的，绝不会有那些兴会神来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领风骚数百年的，又怎会是那些十来廿字的寒偷之篇呢？三言两语，英雄绝无用武之地；区区尺幅，巨匠焉能迴旋周转？繁複深刻的思想，细腻精微的感情，玄奇不有的千态万状，简短之篇绝难曲尽其妙；至于根本人性的剖析，自不是隻字片语所能胜任的了。试想，把歌德的浮士德缩成一首小诗，把迈克兰基罗那创制四载的圆拱大壁画缩成一幅小品，把贝多芬的十大交响曲缩成一阙小调，歌德还是歌德吗？迈克兰基罗还是迈克兰基罗吗？贝多芬还是贝多芬吗？过于简单的作品是绝对没有广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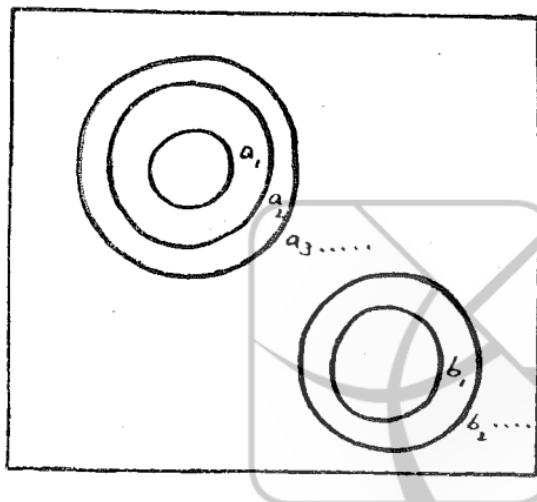
简单的作品不但没有广度，抑且难有深度和高度。

也许有人会说内容丰富，不必是美的唯一标准（criterion）。我们似乎不便说，内容丰富，艺术价值便高。反之亦然。何况繁複的，亦多糟不可言之作呢！话彷彿是不错的，但是说这话的人在有所知的同时，不幸亦有所不知。其所不知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主张指出的是：拿精炼的简篇去和繁複的劣作相较，是极不当的，盖有欠公允。再求我们剖析，繁的作品，如果它玄懈可击，它所成就的，便不仅仅是

内容丰富这一点。内容丰富，犹为余事也。那么它比内容丰富，还多成就了些什么？很多很多。很遗憾的，我们没有一个比较贴切的名词以资说明，我暂时且借用「层次」一语。我妄说：繁复之作，其层次较多。可是层次又是什么呢？我暂时给它下这样的一个定义：

艺术的价值离不了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更大的局部、局部与全体的和谐。凡是应该达成和谐的關係的，便叫层次。

兹以圆示如下：



上图中 a_1 是最小的一个局部， a_2 是包含了 a_1 的一个局部， a_3 是包含了 a_2 的一个局部，以此类推； b_1 是另一个局部，而 b_2 又是包含了 b_1 的一个局部。

基於以上的約定 (convention)，局部与局部之间的關係我们可以表示如次：

$[a_1 a_2]$ 表示 a_1 与 a_2 的關係，

$[a_1 a_3]$ 表示 a_1 与 a_3 的關係，

$[a_2 b_1]$ 表示 a_2 与 b_1 的關係，

$[a_2 b_2]$ 表示 a_2 与 b_2 的關係，

.....

$$[aa_2] = [a_2 a_1]$$

以此类推。

很快的，我们将能看出，繁复之作，层次极多；质简之篇，层次极少，因为繁复之作，局部极多。

比方說作品 w_1 较简，其局部为 $a_1, a_2; b_1, b_2, \bullet$ （注意这是拟想的）那么所需考虑的层次有：

$[a_1 a_2]$ $[a_1 b_1]$ $[a_1 b_2]$

$[a_2b_1] [a_2b_2] [b_1b_2]$ (${}_4C_2$)

共有6个层次。

作品 w_2 较繁複，其局部为 $a_1, a_2, a_3; b_1, b_2, b_3$ 。则所需考究的层次有：

$[a_1a_2] [a_1a_3] [a_1b_1] [a_1b_2]$

$[a_1b_3] [a_2b_1] [a_2b_2] [a_2b_3]$

$[a_3b_1] [a_3b_2] [a_3b_3] [a_2a_3]$

$[b_1b_2] [b_1b_3] [b_2b_3]$ (${}_6C_2$)

共有15个层次。

所以我们知道繁複之作，所需达成的和諧關係远较質简者为多。

同时我们必须妥了解，繁複之作不仅是所需妥达成的和諧關係多，同时还在於头緒紛繁，牽一髮而动全身。譬如一件作品有两个局部 a, b 。若不和諧，我们可以調整之，俾 $[ab]$ 和諧就行了。可是如果現有我们有另一件作品，其局部是 a, b, c ，現在 $[ab]$ 和 $[ac]$ 都相当和諧，惟独 $[bc]$ 不和諧，我们可以不可以单单調整 $[bc]$ 俾 $[bc]$ 和諧呢？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当 $[bc]$ 和諧以后， $[ac]$ 又不復和諧了。这豈不是得之东隅，失之桑榆嗎？如果你必欲使三个层次和諧而后快，那么你得妥同时調整三个局部，而如何調整，調整到什么程度，在在都比简单的煞費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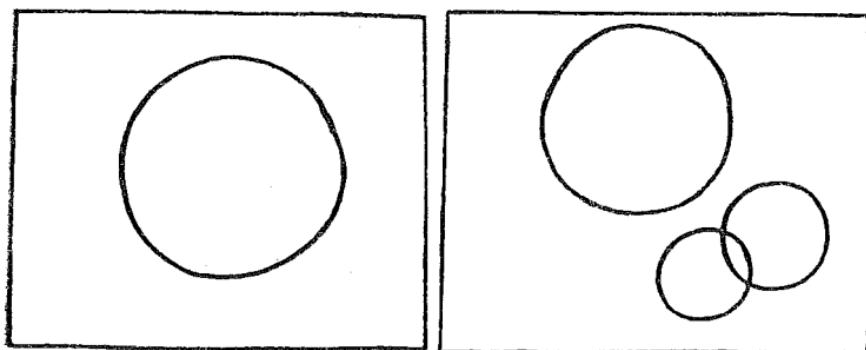
然而，从以上那粗浅而又味同嚼蜡的証論中，我們已經不难明瞭，繁複之作，如果不是許多糟粕的集合体，而是一系列之和諧的組合，那是多么的难能而可貴呵。因为艺术家必須战战兢兢地去避免那牽一髮而动全身的陷穿，而去駕馭那头緒紛繁的大局，还妥面面顧全，如何去避免，去駕馭，确是一个艺术家的試金石。这个關係的网，不是容易編織的。

我个人在作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經驗：当我的画已經完成了一部份的时候，我覺得大有可觀；可是当把它全部完成以后，我反而大失所望：它並不如我所預期的美好。后来我曉得，關鍵是这样的：原来当我达成了一些新的和諧的时候，我同时又不幸地招致了更多的新的不和諧。

拿一些实例來談吧，譬如我們現在有兩幅畫：A和B：

图A

图B



图A中，我们最先考慮的自然是它的主題（那个圈圈）的形状、大小和位置，然后我们考慮到它的色彩，再来我们考慮到底色，最后我们考慮到主題的色彩与色彩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那种效果；可是图B就难多了，我们不仅考慮到主題（三个不等的圈圈）的形状大小和位置，最难的是考慮这几方面的相互间的關係。这些问题，在图A是不存在的。此外每一部份的色彩与其间互相影响所引起的效果，均須考慮，一如前者。

在品評上我们有时会用到一个字眼：气魄。我以为这个尊号，只有那些繁複的巨構才配承受。有气魄的作品是屬於那些經年累月、艰苦备嘗、表現出惊天地泣神鬼的精神伟力的心血結晶。这种心血結晶，其每一个转折，都經過深思熟慮，俾达到「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它是「伟大」的，令人惊歎不已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他比單純的「好」与「妙」自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因此简与繁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区别。

由於繁与简与艺术价值之间，确有如許的關係，因此詩人徐志摩先生与莎学权威梁实秋先生均不大尊敬三言两語的小詩而鼓励詩人努力地創作長詩。徐先生說小詩所發出的声音「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个小姆指給摑死的。」中国文学史上，長詩和史诗的不振，我们不能不说那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誠然，在質上简单的作品，亦不会好處，好处在主題突出。主題突出我们的注意力就不易分散，我们就比較容易把握住作品的重心。因此对简而优秀的作品我们有这些字眼可用：简鍊、简潔、简明、以简駁繁。简单的作品容易形成一种氣氛，而这种氣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可是仅仅成就了这一点毕竟太过寒儉，必为高才所不齿。同时我们亦不宜以文害意，为語言所誤導，以简駁繁有时是可能的，但并不是說一切的简都可以駕馭一切的繁。简而能駁繁，其「繁」必是繁瑣的繁；繁瑣云云，繁得不必妥之謂也；繁得不必妥，自然繁得不好；拿繁得不好的作品和简得好的作品相提並論，其有失公允，我们前面已經說过了。

記得曾經和朋友談艺，說到金字塔的形状，我的朋友以为那是件傑作，它的简单予人一种质朴、至大至刚之感，所以简单好。其实使我们惊歎的是它的工程的大，而不是形状的简。前者屬於工艺技术的範疇；后者屬於美学的範疇。我们似乎不应因为它是工程上的奇蹟转而給它的形体上美感的評价予溢美之辭。犹之我们不便因为陈小姐長得漂亮就断定她必然不是蠢材。其实把金字塔的形状縮成几吋高（注意：其繁简不因此而改变），你还妥坚持地說它能予人以至大至刚之感嗎？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人家举出来的用意是妥說明繁之为弊，以否証 (disprove) 我们「繁為貴」的理論。依我看它不但否証不了，反而加强了我们的理論。哥特式的大教堂，有些英国的艺术批評家以为很醜，原因是它那过份的裝飾雕刻，非常的工細，精雕細鑿，达於極致。就每个細部而言，的確是很美的，然就整个教堂而言，却适足以形成其醜陋。这样說來，豈不是說明了繁之为弊、简之为貴嗎？其实不然。若就整个来看而果然会显得醜，其咎不在繁。設計者在注意細部的工緻的当兒，忽略了細部与細部间，細部与全体之间的和諧，因此其咎在設計者，不在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里看出，在一繁複的創作的过程中，陷穿是如何的多；陷穿之多适足以証明能避免落於陷穿是如何的难能而可貴。

●局部当然是不可数的，我们只是把它单纯化。

美術的節奏

一切的艺术，常常离不开节奏。节奏的艺术，固然出於人类的創造，然而对节奏的要求，却是自然而然的，先天的，本能的。我们試觀海潮的往復，雷鳴的間作，便会不期然地生崇敬神往之感，这就是因为我们对节奏有先天的要求。

就音乐而論，音乐离不开拍子，而拍子就是节奏的基礎。音乐不但离不开节奏，而且一首乐曲的情味或风格，也常常以节奏为主要求的决定因素。巴哈的乐曲严谨，贝多芬的乐曲雄渾，莫札的乐曲轻快，这些特色的形成，主要求也同。因为各别的节奏不是一首进行曲和一首华爾滋的不同，仅就其节奏本身便可以观察出来了。一首夜曲与一首輓歌的差别，主要求还是节奏的差别。

原始民族的音乐在旋律上固嫌幼稚，然观其节奏，也不可謂简单。非洲黑人音乐的节奏具有痛快淋漓、热情奔放的特色，予爵士音乐以頗大的影响。事实上，光是节奏本身，便有引起审美愉快的能力了，要不然，击鼓一技又怎么会为人所欣賞呢？

再說詩歌，西洋詩本末就有一定形式的节奏，如 *iambus*, *trochee*, *dactyl* 等等，便是利用西洋文字音綴上轻重(*accent*)的不同而構成的节奏的格式。

他如舞蹈，就更离不开节奏了。舞蹈的艺术，实在是兼备了时间的节奏，与空间上的节奏两重的特色。

因此我们不难明白，节奏实在可說是艺术生命的源泉；我们縱使不可說沒有节奏便沒有艺术，但至少我们可以說，沒有节奏的艺术就像沒有放油盐配料所做出来的菜一样的乏味。

音乐、詩歌、舞蹈的节奏是比较地容易了解的。美术的节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恐怕便稍微不如前者的简单了。这不是說美术的节奏一定比音乐或詩歌的节奏深奥，而是說它的意义相当的分歧(*ambiguous*)和含混(*vague*)。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为一些人不够审慎，

未尝細心分辨节奏一詞的原義，却把一些別的觀念綾在一块兒，玄異里說的是張三，心里指的是李四，叫人如何摸得着头脑？有些人說氣韻便是节奏，有些人則說調子便是节奏。这些說法是否妥當，繫於氣韻、調子等詞的約定俗成的意義是什么，和节奏的本義是什么。

我们且慢批評以上的說法，不妨先看看美学家的說法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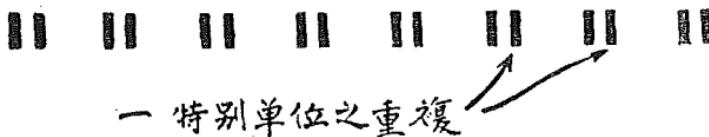
Ernst Grosse 在「艺术的起源」一書說得很清楚：「节奏的本质形态，是某一个特別单位的有規則的重複；玄論是一种声音、一种动作以及一种图形，都是的。然而节奏的单位並不一定要严格意义的一个单位；祇要有一个单位的作用的，都可标在內。」以上这一段話恐怕是节奏一詞比較恰当的定义。

其实我们必须明瞭，节奏这一个概念原本是音乐的。其后我们把它推廣，才变成統攝於一切艺术的一个概念。在音乐的記譜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乐曲总分为若干小节，每一个小节里又有若干拍子，第一拍稍强，这一来每一小节的对应的拍子，不就成了 Grosse 所謂「某一个特別单位的有規則的重複」了嗎？我们似乎不宜忽略了 Grosse 的話的后半段：「然而节奏的单位並不一定要严格意义的一个单位；只要有一个单位的作用的，都可以标在內。」这話也不难了解。譬如一首乐曲第一小节的第一拍是一个四分音符，第二小节第一拍則是一个四分休止符或两个八分音符，則一个四分音符和两个八分音符固然不同，然均可視為单位，我们可以說，后者是前者的重複。可見 Grosse 的話虽然抽象，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不难發現其中实已涵蘊了一切艺术的节奏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說好些關於音乐的节奏的話，目的是要看节奏這一個概念，如何从音乐推廣到美术來。如果說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那么我们不妨說美术是空间的艺术了。所謂「某一特別单位的重複」的单位，在音乐上是时间的单位，在美术上，是空间的单位。所不同的是时间只有一度（1 dimension），普通的空间前有一、二度（繪画是二度空间的艺术）和三度（雕刻和建筑是三度空间的艺术）。

一度空间的节奏是指在一直線上所表現出來的节奏而言。譬如我们在一直線上分列若干綫段，在每綫段上若干「特別单位的重複」，

就整个而言，是一种节奏的表现。如图：



一 特別單位之重複

以上的一种比较简单的节奏就是通常的图案，在装饰上，我们常常用得着它。即使是原始民族，也并非不了解这种节奏有其审美的价值。在一个原始民族里，「一个人祇有机会得到許多牙齿、螺壳等串起来作颈饰，它就将它弄成为有节奏的一套。但如果我们就此下一个结论，以为原始民族的节奏排列，主要的意义是在实用，那么我们只要看一看普托库多人的通用颈饰，就能找到製造者並不缺乏对美感的欣赏上的证据。他们现在是将黑的果实和白的牙齿很有规则地交错着排列的，如果他们真不欣赏节奏美的話，他们就将很任意地乱串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由两色组成的节奏，确比单祇一色的螺壳的或贝壳的项练进步得多。——这就是說原始人实践更多的变化，更丰富的节奏的原则，一定比发现这种原则容易得多。」（Grosse：「艺术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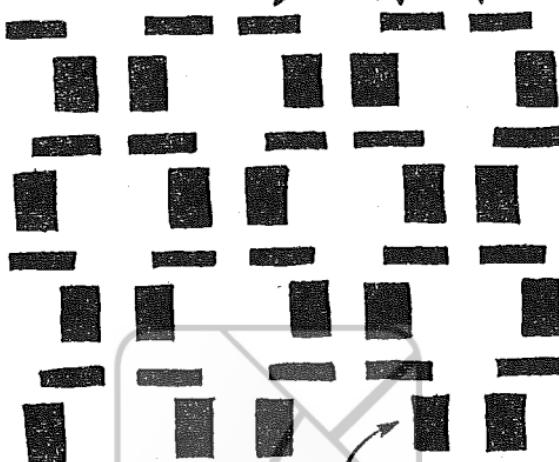
二度空间的节奏也不外是在平面上「一特别单位的重複」，如图所示（见于59页），便是平面上节奏的一个例。许多的图案，都表现类似这样节奏。我们试一看布料的花纹的设计，就可以看出许多平面的节奏。

至于三度空间的节奏，亦相类似，亦不外是立体上「一特别单位的重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从许多建筑物或抽象雕塑上找到。

但是關於美术的节奏的話我们才說了一半。有人会这么想：照前面所举的一些例子看，則所謂节奏，豈不仅是机械的重複嗎？果如此，則捉住了一个基本的形式去「依样画葫蘆」，豈不就形成一种节奏了吗？如果节奏之为物是这样地简单，又有什么稀奇；具有节奏的图形，如果就是这样呆板，又有什么看头？

對於这些疑问，我们实在有一一加以答覆的必要。不錯，美术忌呆板，貴創造，能够「依样画葫蘆」的，就不难能可贵。但前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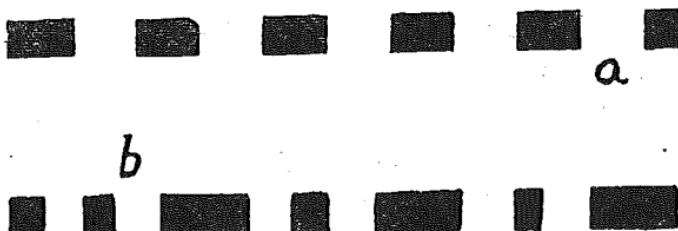
一特別單位之重複



另一特別單位之重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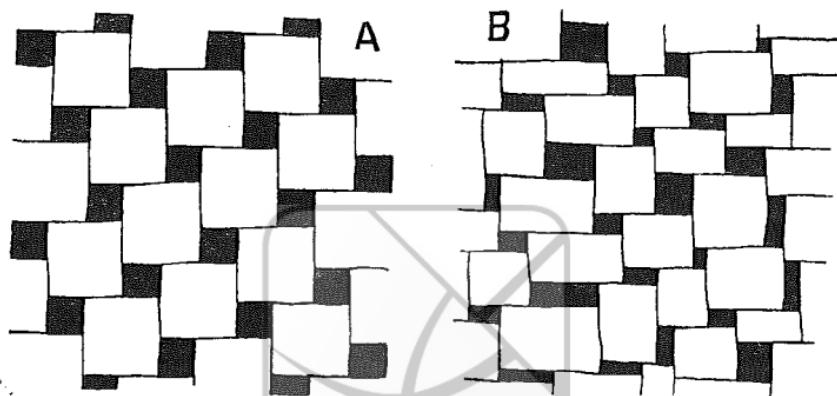
例，只不过是从最简单的說起，並不是說节奏之为物就仅仅是这些东西。上面所举的节奏的例子，我们不妨称之为「原始的节奏」。

为了言說的方便起見，我们不妨用例子說明，假如我们有一个「線性节奏」的图形如图(a) (一度空间的节奏我把它叫做「線性节奏」*linear rhythm*)这样的一种图形我们在編织物上常常可以看到。这里面所表現的节奏我们固可說它有几分美观，但不免嫌它呆板，如果我们把它加以变形如图(b)：



如是我们或許可以說，經過变形后的图形更可免於呆板。

二度空间的节奏，情形也相类似。譬如我们有一个平面图形，显现出一组平面的节奏如图(A)。我们试细加体视，就不免会这样想：这样一个图形也不过是大、小两种方形依照某种方式的重複而已，亦难免於呆板。为了免於呆板，我们想办法加以变形，譬如把它变成图(B)。这一来我们或许可以说图(B)比图(A)更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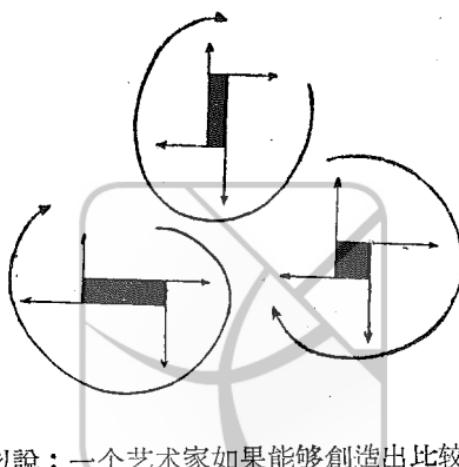
同样的，三度空间的节奏，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使它免於呆板。

「寓变化於整齐」，这是一切艺术的一个原则。整齐便流於呆板，变化便免於呆板。从二者当中择取一条中庸之道叠次上升，方可望达到艺术的极峯。因此从(a)变到(b)，从(A)变到(B)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不予以忽略才是。这个过程象徵着艺术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幼稚状态。

我们也可以採取这样的一种看法：若說图形(a)、(A)所表現的节奏是一次的(first order)，那末图形(b)、(B)的节奏便是二次的(second order)。在图(a)或图(A)中我们有许多規律。若打破一种規律，所得到的新图形，我们說其节奏比原来的高了一次。同样的，如果我们从图(b)或(B)中再打破一种規律，而形成图(c)、(C)，則我们可以称之为三次(third order)的节奏图形。如是推衍上去，我们可以建构四次五次甚至更高次的图形。

我们說图(B)比图(A)高了一次是因为在图(B)中，許多

規律中的一種規律已經給打破了。也就是說還有些規律未經打破。譬如就圖(B)而言，許多黑、白色的幾何形體是矩形。這一規律未經打破。許多黑色的矩形的四邊一端向外延長，這種延長，有一定的趨勢，即是依照順時鐘的方向（clock-wise sense）。這一種規律未經打破。



我們也可以說：一個藝術家如果能够創造出比較高次的節奏，則他是一個在節奏藝術上，比較成功的藝術家。不過這句話還得加些腳註。如果說一個藝術家若能創出更高次的節奏，那末他便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藝術家，豈不是等於說：打破越 多的規律，他的作品越成功嗎？这么一問，就迫出「節奏的艺术」這個論題來了。對於以上問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當然，如果目的僅僅在乎打破規律，結果只會形成大紊亂，而大紊亂本身未必就是美。難處在：如果要追求美，打破一種規律，你必須要遵循一種或幾種規律。譬如就圖(B)而論，其中的正方形雖然變成了矩形，但這些大大小小的矩形可分為三種：扁平的、修長的、近於正方形的。如果這樣的一幅图形尚 說得上美觀，就必定要使各種樣子的矩形在數量的比例上很適當，可以「中和」起來，正如若干量的酸一定和若干量的鹼可以中和一樣。而三種矩形，在位置的分佈上要很配，好像它們的「重心」就在圖的中央。這豈不是招來更多的規律、更多的束縛嗎？可見要進入藝術的寶殿是多

么的困难。

到这里我们已經可以說气韻或調子和节奏根本上是两回事了。

气韻一辞，最初見於南齐謝赫(479—501)「古画品錄」一書，是为六法之首。可惜他未加詳細說明，历代学者的說法亦頗糾纏不清，因此我们很难确指其义蘊。譬如，印度学者巴齐(B.C. Bagchi)說它是「气势」和「韻味」；日本的 Kakasu Okakura 說「外物往來运动的情状，其閑照襯映的地方，皆須和諧合法，即是气韻。」方薰在山靜居画論說气韻就是生动的別名。也有人說气韻即是动势和韻律。玄論採取哪一种說法，气韻究与我们上面节奏的定义异趣，因此它们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一定委說节奏是气韻，則这个节奏不必是我们所說的节奏。正如叫做張三的那个胖子和叫做張三的这个瘦子未必是同一个人。

至於所謂調子(tone)，一般是汎指利用色彩与色彩之间的互相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別的綜合的情味而言。(若单色的繪画則利用濃淡的關係)。譬如一幅描写清晨郊野轻霧迷濛的图画，所用的色彩是柔和的，其色彩间的对比亦不强烈，我们可以說这幅画有着清淡的調子。又如一幅靜物画，其中有火紅的苹果，深綠的香蕉，橙黃的橘子，普蓝的桌布，棕色的飾物，其间的对比强烈，予人以灿烂、华丽之感，我们可以說这样一幅画有着濃烈的調子。調子是指一种特別的綜合的情味而言。

所謂美术的节奏，既是指局部图形在空间的分佈而言，分佈得恰当与美妙，我们說它具有优美的节奏。

在現代西洋的抽象繪画(Abstract or non-representative art)中，我们可以看到許多天才正在致力於各种节奏境界的創造，其中以荷兰画家蒙得里安(Mondrian 1872—1944)为最著。試觀蒙氏的作品，就可知其特別強調节奏，他曾經毫不厌倦地画过許許多大大小小方格的組合構图，粗心的人或許会說他神經病，不了解为什么他脑袋里装的尽是小方格，但是耐心的鑑賞家不难渐渐玩味出其中的美，更耐心的批評家会为他分析其中的美之所以美。事实上蒙氏这种繪画在当时确乎得不到人们的賞识，但是他有的是坚强的自信心，在

寂寂无名中辛勤的工作了三十年，此期间曾与友好創處 De Stijl 來誌，宣揚他对繪画的觀點。以后他的繪画不但果能在画壇上佔一席位，而且还影响到現代建筑和傢俱的設計呢。

也許有人会發生一个疑问，节奏的美，是否只在抽象繪画上或抽象雕塑上才能找到呢？在形似的繪画上，能否也能找到节奏的表现呢？對於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粗略地說，抽象美术比较容易集中地表現节奏的美，可是这話並不意味着：形似的美术就不能表現节奏的美。我们且看，如果是一幅海景，那末潾潾的水波和片片的云彩，便涵有节奏的美；如果是一幅街头小景，那末一层层的石級和一堆堆的木板，便涵有了节奏的美。凡果 (Van Gogh) 的风景画常画了一大片金黃色的稻麥，也涵有若干的节奏美。印象派里面的点彩派，尽是用块状的原色来綴成各种形像，就每一局部来看，都十分富於节奏美。

現代的建筑物力求简化，但在节奏美方面的进步，却是有增无已。許多室內的裝飾，牆壁和地面用两色或三色的小瓷片綜錯而不按一定的規則地鋪砌，也极富於节奏美；有些圍牆用大小不等的石块作不規則的堆砌，亦极富於节奏美；有些高楼大廈虽然简单到像个火柴盒子，然而我们若从远处看其窗扉的分佈，及其色調的錯列，亦不难發現其頗富於节奏美。

關於节奏的艺术，我惭愧沒有許多高明的話可以奉告，不过美术之道，百变不离其宗；节奏的表现，也离不开「均衡」一个道理，把这个原則加以巧妙的活用，这是艺术家責宏勞貸的事。当然，關於节奏的美，这里面一定有許多原理，至於这些原理的探究，那就有賴聪明的头脑了。

詩品的文學觀

鍾嶸的「詩品」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思深而旨远的詩歌批評专著，实开中国詩論的先声，在中国文学批評史上地位之卓著，与西方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可謂等量齐观；跟同时代而稍早的劉勰的巨著「文心雕龙」，可謂中国文学批評史上的双璧，其影响后世文学批評思想之巨，可謂玄与倫比。玄怪清代史家章学誠在他所作的「文史通义」里面「詩話」一篇中，曾对它推崇备至，說它足窺艺术天地的秘奧。

本來，中国詩歌批評理論之出現，並不始於「詩品」，如「論語」所說的「辞，达而已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玄邪。」这都不妨說略微表露出一鱗半爪的文学思想，可是从严格的意义來說，却不好称是文学理論。降及魏晉六朝，所出現的文学批評的文字，数量自不可謂不多，如曹丕有「典論論文」，曹植有「与楊德祖書」，应瑒有「文論」跟「文質論」，陆机有「文賦」，可謂不一而足。这些固然都不失为中国文学批評史上重妥的史料，可惜有者迄未闡發、有者語焉不詳。「論文」只是叫作家「审己以度人」、勿偏执、勿相轻；文賦所論，多半只是自身的創作經驗；「与楊德祖書」，亦不外是鼓吹一种勇於接受批評的雅量。这些都不足以提出一套思深而旨远的理論，因此在某一方面，它们跟「詩品」实不足以相提並論。

「詩品」之作，乃緣於作者对当时那种彫琢堆砌、宮商声病、繁密巧似、用事用典的文学风气有所不满，故思褒贬優劣、定其差等，以风規后世。鍾嶸既然有意要做「褒贬優劣、定其差等」的具体詩評工作，那么他在对作品褒贬、裁判、論断之际，必定有相当的根据。哪些地方是瑕疪的所在，哪些地方是优点的所在，自須一語中的、正中要害。总之：他必須陈列出他之所以委作如此裁决的理由。換言之：他必須有他的標準与尺度；他必須有他个人的文学觀。

然則鍾嶸的文学觀究竟是个怎样的文学觀呢？玄奈他自己却未尝条分縷析地为他心目中的文学觀陈示一个井然的体系，所以我们玄由

得而指之。可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有办法以鉤玄提要的途径替他归纳出一套属于他的文学观。正基于这个文学观，鍾嵘曾着手对汉魏以降的一百多位知名与不知名的诗人的作品进行批评分析。因此，我们容或可以不同意他的品评，我们甚至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我们却不能否認他的評論是有所本的。何所本呢？这就是我们要指出来加以論列的重点所在。要而言之，「詩品」的文学观，其内容主要的殆不外是下列的几项：

- (1) 主情思
- (2) 务自觉
- (3) 兼文质
- (4) 反声病
- (5) 重含蓄
- (6) 尚渊雅
- (7) 轻造作
- (8) 病故实
- (9) 貴独創
- (10) 察流变
- (11) 执中庸

以下我们将逐一加以剖析：



(1) 主情思

「詩品序」一開始就說：「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烛三才，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神鬼，莫近於詩。」詩的效用既足以「动天地、感神鬼」，然則这种「动天地、感神鬼」的伟力又何所緣而生呢？曰：緣情而生。因为性情之搖蕩，形諸中，發於外，筆之於書，宣之於口，就成为「动天地、感神鬼」的不朽詩篇，可見「情」的要素在詩中是如何的不可或缺。

鍾嵘批評永嘉时代孙綽、許詢、桓、庾諸人的詩篇，每以他们缺少「建安风力」而引以为憾。我们知道「建安风力」的主要内容，正

是情。然則鍾嶸着重感情这点就可以概見了。所謂「吟詠性情，亦何貴乎用事？」這話說明了性情的充足性。在他看來，詩人受了時、地、物、色、身世的觸發，自不能空動於衷；情感因為有所動，文思就會有所發。所以他說：「凡斯种种，感蕩心灵，非陳詩何以盡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懷？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而「怨」，也正是情感的一種形態。

然而，雖然鍾嶸於詩主情，却又力主益之以思。因此，情切而思深的陶詩，在齊、梁之際雖未受到應有的賞識，惟獨鍾嶸對他傾服之忱，溢於言表，說他為人空爭心，為文淵潤而含蓄（「辭婉」），說他從心不踰矩而云淡風輕（「興愜」）。他的詩比起僅僅的「田家語」，所多的是個人的深思。陶詩之被他列為中品是否得當，我們暫且不論，但他之欣賞陶詩，却是顯而易見的。而他之欣賞陶詩，也是因为他兼情思。

因為情必輔以思，然后才能免於偏頗，賞接高趣，所以当他品味張華的時候，就不免會因為張華情感泛濫而感到遺憾，所以委恨他「兒女情多，风云氣少」。可見「泛情主義」在他看來不尽可貴。若一任情感泛濫，則不免流於傷感，所以他雖然主情怨，却以怨而不怒為極至，故以其評直峻切、傷於淵雅而第之中品，可見「以思濟情，情思交鍊」才是天下的至文。

（2）務自覺

所謂「自覺」，是指對文學本身價值的自覺。文學對人生的偉大功能固然不一而足，可是文學的價值不應仅仅取決於它的功用。文學有它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它不是其他學問的附庸或手段。對於這個道理，「詩品」也有所闡明。

按魏晉南北朝乃是戰亂頻仍的時代。變亂紛起，綱紀廢弛。一般人因為深恐動轍得咎，故多尚明哲以求保身，每喜巢居穴處以韜光養晦。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現象之下，老莊的玄學於是乎極一時之盛，蔚為一時風尚。在這種談玄說理的歪風掩蓋之下，詩歌的情韻自不免被玄理所侵蝕而喪失自己的本質，以致流為哲學的附庸，這不能不說

是詩歌的大忌。對於这种通病，鍾嶸在「詩品序」中曾大加撻伐，深以替談玄作詮釋、給仁義作注脚为非，並且以為这是当时某些詩歌之所以平淡玄奇索然寡味的原因。可見在鍾嶸心目中，他总以为对文学的独立意义，我们务必有一种自觉——自觉文学本身不必也不該靠文学以外的事物以壮其声勢。

(3) 兼文質

鍾嶸奉「文質彬彬」為論詩的圭臬，而不左偏右袒。文勝於質，固然有所欠缺；質勝於文，究非不是遺憾。必須文質兼备，而后方可謂能得風騷之旨。这种見解在文风卑靡、滔滔皆是的时代，不可謂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看法，也不可謂不是中肯的看法。

我是之故，鍾嶸「詩品」，於時則首重建安，以為建安時代的詩歌「彬彬之盛，大备於時」；於人則独推曹植，說他「体被文質，粲溢今古」。而對於文質二者有所偏頗的作品，就每有貶抑之辭。可見在他，文質二者任何一端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因此，所以他不能不慨叹东汉的頗风，說「班固詠史，質木玄文」；說劉楨「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永嘉時詩「理過其辭」。而另一方面他又嫌宋孝武詩「雕文織綵，過於精密」。可見文質兼备、文質並重乃是他對詩歌的要求。

从今日文学的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說鍾嶸的这个看法，是个頗为稳健的看法。因为內容、形式实在是相互为用的，而不是一对冤家。合則两全，离則两伤。捨形式則內容仅只是一堆未經處理的原料；捨內容則形式仅只是韵律的练习。內容形式孰重之辯，有时显得玄謂。

(4) 反声病

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声病之說极其披靡的时代。一般文人士子作詩为文，用字每究清濁宮羽。沈約有「四声譜」之作，提出「四声八病」的說法，作为写詩遣詞用字时在声韵上的戒律与守則。在这种調声协律的风尚的披靡之下，一般詩人每趋之若驚。唯独鍾嶸深知其弊，故不以为然，覺得这种过份拘忌声病的歪风必須有以匡正，以为「文

多拘忌，伤其真美。」可見對於強人所難而又玄闇宏旨的声律，他是反对的。可是他也並不因为过份詬病声律就「因噎廢食」，而籠統地反对説求声韵「自然調利」的諧美。遇到声韵諧美的詩篇，他还是委加以讚美的。因此当他品評張協時也仍委讚他「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这样看來，鍾嶸又何嘗以講究声調諧美是絕對的弊病呢？矫枉過正才是弊病。

(5) 重含蓄

詩以含蓄為貴，这也是「詩品」的一个重委的文学觀點。在他的心目中，欲「詩之至」，則言內之事跟言外之旨必須兼顧。在技术上，就是賦、比、興三种手法必須适当而巧妙地加以配合、酌量地加以採用，以达到最佳的比例。这一來，就可望能有「文已尽而意有餘」、「味之者玄極」的妙用了。若是閑門見山、一瀉玄遺，那就不免流於膚淺平淡，所以他說：「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正因为他有以含蓄為貴的見解，所以在具体的批評上，他也拿含蓄当做一种美德。玄怪当他批評古詩的時候，說古詩「文溫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謂几乎一字千金」；当他批評阮籍的時候，又讚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风雅。」这都說明含蓄是何等的可貴。

(6) 尚淵雅

「情兼雅怨」在鍾嶸看來是作詩的极則。阮籍之被列为上品就在乎他「洋洋乎會於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应璩的詩原属平实，可是就因为他「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刺激之旨。」故仍得列中品。嵇康虽称「託喻清远，未失高流。」本应列为上品，但玄奈却以「許直露才，伤淵雅之致」而屈居中品。可見鍾嶸「品詩」，总以雅正为貴。

(7) 轻造作

「詩品」的文学觀，在某一个意义上不妨說是自然主义的文学觀。以自然主义的文学觀看來，作詩為文，該是出自有感而發的，切忌凭空捏造、玄病呻吟。因文造情地「欲賦新詞強說愁」，自当摒

弃。行文賦詩純然是「行乎所當行，止乎不得不止」的事。所以「詩品序」開宗明義就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形諸舞詠是因为情感的激蕩而非此不乐使然，不是勉强作伪；而性情之所以会激蕩，則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受到外界环境事事物物的感应而發生。这种見解，对那些乍看似富感情，实則因文造情的詩篇，可說是一种有力的鍼砭。曹植的詩歌之所以榮居上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真能發乎情而形諸詩。总之，在他看來，詩歌的創作总得決於詩人的經驗与感受。沒有某种經驗与感受而尙勉强敷衍成篇，便犯造作之忌。

(8) 病故实

宋齐以来，駢偶堆砌的歪风日獗。譬如顏謝所作，就已一味誇示博学，於是乎經文典故，引用连篇。流风所及，自然就大損詩歌的情韵。針對这个流弊，鍾嶸提出异议，以为只有像「經国文符」、「撰德駁奏」这一类应用文，因为有必委詳徵博引，才不妨偶而「用事」可是首重情緻的詩歌，則不宜多用典故堆砌。在他看來，任昉就是这么一个典故病的患者，所以对他頗有微辞，說：「任昉博物，动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効其如此，弊矣。」这就把競事典故堆砌的流弊說得够明白了。

(9) 貴独創

對於天才詩人曹植，鍾嶸曾讚他「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卓而不羣」是說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的意思。也說明了他对独創的重視。

對於元嘉詩人謝灵运，他极力推崇，竟列於陶潛之上，說謝詩「有景阳之体，故尙巧似」这样地高下陶謝，是否公允，我们暂且不論，可是他对謝詩在那个时代重大意义，当是有所察覺的。早在詩三百中，兴、观、羣、怨之旨以及鳥、兽、草、木之名，都已不具备，唯独精巧的景物描写，却付闕如；偶一及之，也不过是像「汉之廣矣」之类一言半語粗陋之句，实已以状山水於万一。降及汉魏，山水之篇，亦不为多。到了元嘉年间，才有謝灵运出，始創刻画山水之

篇，對於景物情态形象的描摹，可謂极「巧似」之能事，因此时人每有「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說法。謝灵运在山水詩始創的地位是如此的重姦，玄怪他被尊為「元嘉之雄」。可見鍾嶸對「獨創」一端，是如何的重視了。

鍾嶸之重視創新的思想，还可以从他的反对摹拟反映出来。他举过一些例子，說明东施效颦的玄謂，还說那些学鮑照的傢伙「徒自弃於高明，玄涉於文流矣。」

(10) 察流变

鍾嶸論詩，有着一种历史的觀念，所以他在序里面，对五言詩的产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提示出一个简明扼要的詩歌發展史。不过它並不像劉勰在「明詩篇」那样，着重指陈历代詩歌的共同风兒跟时代背景。鍾嶸所着重的是历代詩人的阵容跟他们各别的艺术风格，以及各別风格之所由形成的渊源。这倒是「文心」所未尝注意到的。

然而，这种抱持历史觀点來論詩的态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我们明瞭詩歌發展的轨迹，並且可以使我们把詩人放在詩歌传统中予以評价，可是在具体地評定时，源流的指出，对詩歌的优劣却未必可以作为一个標準。我们不能因为甲源於乙就說甲优於（或劣於）乙。总之，察流变只是有助於对风格类型的辨認，而未必能使我们知道孰优孰劣。

鍾嶸「品詩」有个爱列「家譜」的脾气，总爱送人个把祖宗，有时竟言之鑿鑿，許多学者都說他不免牽强附会。这点我们不感兴趣，因为这玄闇乎文学觀。即令錯誤，也只是判断錯誤罢了，並不是文学觀的錯誤，可不辨矣。

(11) 执中庸

所謂「执中庸」，是說在品評之际，每每考慮到詩篇中若干个特质孰轻孰重是否配合得当、是否矫枉过正或有「有者过之有者不及」的意思。这在「詩品」是个頗重姦的文学觀。若在一篇作品中，一方

面过度地发展以致臃肿，另一方面又未尝充份发展，则总不能称是傑作，因为詩歌是高度的综合体，必須具备各方面的內涵，还須配合得当，否則总难免有所欠缺。正因为有这个了解，「詩品」在进行評論之际，每以是否得「中」作为一个標準尺度。我们在上面說过鍾嶸力主「兼文質」，而「兼文質」就是一种「执中」的要素。理想的詩歌是「宏斯三义（賦、比、兴），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玄极，闻之者动心，是詩之至也。」（序）这就隐含着「执中」的要素。

在鍾嶸的心目中，曹子建是个頗能得「中」的詩人，所以他委予之以最高的喝采。說他「骨气奇高，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从內容方面說，「情兼雅怨」就是情与志的調和；从形式方面說，「体被文質」就是雕而能润，廣施人工而又接近自然。既有「奇高」的「风力」，則「詞彩」何妨「华茂」？从风格方面說，骨气与文体既然坚实，精神自显现得活潑。总之，玄論是从內容上、形式上还是从风格上看，子建均深得「中庸」之妙諦，玄怪「詩品」委对他推崇备至了。

正因为坚持着「执中」的觀念，所以对那些在某一方面嫌有所缺，或某一方面嫌有所过的詩篇，「詩品」总不会予以最高的評价，例子太多，可謂不胜枚举。

以此，鍾嶸在「詩品」中所表現的文学思想，乍看似不一致，彷彿矛盾。譬如他反对声病，可是却不以为「口吻利調」、合乎自然节奏不是件好事；他崇尚情感，但却以为情感泛滥是一种流弊；他不貴雕飾，却遺憾某些詩人「雕潤恨少」，且以「詞采华茂」是一个很高的褒詞；他推許比、兴，却以为比、兴用得太多会流於「詞躉」。凡此种种，是否意味着鍾嶸的文学觀自相矛盾呢？我们不必这样看。因为一种优点若不适当当地运用，就适足以流为缺点。委使优点仍不致流为缺点，那就委「执中」。

也可以这么說：以前的各节所論的，是鍾嶸对「执中」所可指涉的若干具体内容，而「执中」则是以前各节背后的基本原理。所以「执中」玄疑是鍾嶸的文学觀里面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觀念。

論述過「詩品」的文學觀之後，我們不難了解到：「詩品」成書，去今雖達千載，可是即使是从今日的標準而論，其文學觀仍不失為平實的文學觀。它的若干觀點在今日看來雖不可謂新奇，但却是放諸四海皆準、垂諸百世皆真的，縱使「詩品」並未刻意地構作一個系統井然的批評理論體系，故所論或嫌粗略、或欠發揮，但可貴的是它頗富啓示性，往往仗手拈來的隻字片語，就已經够使我們有所領悟了。當然有些地方容或尚待商榷。譬如用典，似不應該列為絕對的禁忌，因為用典而得其當，效果往往是意象迷濛而涵蘊丰富，在某種情形之下，這不但可以被容許而且還是值得鼓勵的。至於察流變，鍾嶸太喜就玩此道，以致难免附會，實則源流的辨析，縱非絕不可為，亦未必闕乎宏旨。然而，即使「詩品」不可諱言地有着若干瑕疵，但由於它極富啓示性，故亦尚頗堪研讀。它的文學觀，跟「文心」那種「原道的、抒情的、創造的、自然的」文學觀，更可謂互相表里、互相發明、互相補足、相得益彰。所以說，它虽然是「大醇小疵」「少損連城之價」，這終究只是求全之謬罢了。



隔靴的搔癢 **曾熾豪著**

主編・新社文藝編委會

督印・周榮

出版・新社

發行・教育出版社

新加坡歐南園第19座177A

業務經理：陳德復

印刷・文化印務公司

初版・一九七一年七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1.00

作者簡介

曾熾豪，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現為中學教師。曾君除擅長寫作外，也頗醉心現代繪畫，造詣亦高，經常有作品參加展出。



隔靴的搔癢

